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 授权模式研究

朱娜娜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全媒体时代为背景,以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为目标,着重分析了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所独具的社会价值,并对其特殊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行定位。作者对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版权纠纷及其根源做了深入剖析,并对现有的及尚处于探索中的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理论模型。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研究/朱娜娜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121-34918-8

I. ①全… II. ①朱… III. ①数字图书馆—版权—委托(法律)—研究 IV. ①D91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1849号

策划编辑:牛平月

责任编辑:刘元婷

印 刷: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 000 1/16 印张:8.5 字数:163.2千字

版 次: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010) 88254454。

■ 前 言

PREFACE

数字图书馆建设方兴未艾，但版权纠纷层出不穷。利用高效的版权授权模式取得权利人的授权，是数字图书馆解决版权问题的根本途径。本著作分析了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指出数字图书馆区别于一般网络运营商而具有的独特信息网络传播价值。同时，数字图书馆还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法律性质为公益性质，法律地位集版权人、版权作品传播者和版权使用者三重角色于一身。鉴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的各环节会涉及不同的版权问题及权利类型，本著作在对全媒体环境下现有的及尚处于探索中的各种授权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从权利分解角度设计，将授权模式整合于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提供服务的各具体环节之中。

作 者

■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1
1.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1
1.1.2 课题研究的目的是	2
1.1.3 课题研究的意义	3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3
1.2.1 国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3
1.2.2 国内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6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8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9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9
1.3.2 研究方法	11
1.4 本研究的预期创新点	11
1.5 本章小结	12
第 2 章 全媒体与数字图书馆发展概述	13
2.1 全媒体的由来及发展	13
2.2 全媒体的概念及特点	16
2.2.1 全媒体的概念	16
2.2.2 全媒体的特点	18

2.3	全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	19
2.3.1	网络媒体	19
2.3.2	移动数字媒体	21
2.3.3	互联网电视	22
2.3.4	社会化媒体	24
2.4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26
2.4.1	数字图书馆发展概况	26
2.4.2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机遇	29
2.4.3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2.5	本章小结	32
第3章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法律定位	33
3.1	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33
3.1.1	数字图书馆以天然馆藏为依托, 具有更丰富的信息资源 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34
3.1.2	数字图书馆的稳定性是长期保存数字资源、传承文化的 保证	35
3.1.3	数字图书馆的公益性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	35
3.1.4	数字图书馆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	36
3.2	数字图书馆的特殊法律性质	37
3.2.1	公益性和非公益性之争	38
3.2.2	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	39
3.3	数字图书馆的特殊法律地位	41
3.3.1	信息资源使用者	42
3.3.2	信息资源传播者	43
3.3.3	信息资源生产者	44
3.4	本章小结	45

第 4 章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版权纠纷 及其根源分析	46
4.1 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的产生	46
4.2 数字图书馆遭遇版权纠纷的主要环节及版权类型	48
4.2.1 馆藏资源数字化过程和复制权	49
4.2.2 信息资源传播过程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50
4.2.3 数据库开发利用过程和汇编权	52
4.2.4 社会化媒体利用过程中的信息版权相关问题	54
4.3 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的根源分析	62
4.4 本章小结	63
第 5 章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的分析与比较研究	65
5.1 现有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分析	65
5.1.1 单独授权	65
5.1.2 集体授权	67
5.1.3 要约授权	70
5.1.4 版权代理机构授权	73
5.1.5 共同体授权	76
5.1.6 DR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数字权限管理)	78
5.1.7 Google 模式	79
5.2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的新探索	82
5.2.1 法定许可	82
5.2.2 强制许可	83
5.2.3 默示许可	85
5.2.4 版权补偿金	86
5.2.5 开放存取	88
5.2.6 创作共用 (Creative Commons)	90
5.3 本章小结	92

第 6 章 全媒体时代面向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版权授权模式的整合	93
6.1 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93
6.1.1 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必要性分析	93
6.1.2 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可行性分析	95
6.2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基本原则	97
6.2.1 私权保护原则	97
6.2.2 利益平衡原则	98
6.2.3 “风险-效率”原则	99
6.2.4 系统协调原则	99
6.3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具体思路	100
6.3.1 馆藏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的版权授权模式	100
6.3.2 作品传播过程中的版权授权模式	102
6.3.3 数据库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版权授权模式	106
6.4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模型的构建	107
6.4.1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模型的构建过程	107
6.4.2 模型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109
6.5 本章小结	111
第 7 章 版权实践	112
结语	116
参考文献	119
附录 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相关案件	124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1.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图书馆建设方兴未艾。2004 年 12 月，国际著名搜索引擎公司 Google（谷歌）与哈佛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 5 大图书馆合作，推出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数字图书馆计划——“Google Library”计划。2005 年 4 月，由法国国家图书馆牵头，欧洲 19 所国家图书馆负责人在巴黎发表联合共建欧洲数字图书馆的声明。截至目前，除了英国和葡萄牙之外，欧盟其他国家都宣布参与该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由教科文组织及 32 个合作的公共团体共同成立、由全球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导开发的世界数字图书馆（the World Digital Library）网站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在地巴黎正式启用。参与这项计划的馆藏与技术合作国家，包括巴西、英国、中国、埃及、法国、日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及美国等。而在国内则涌现出了清华同方、北大方正、重庆维普、超星等一批知名的数字图书馆运营商。国家图书馆 2 期暨国家数字图书馆也于 2008 年 9 月 9 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成为世界上第 3 大国家图书馆。从国内外数

字图书馆的建设实践来看，数字图书馆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

但是，随着各国立法表现出强化权利人权利的趋势，以及权利人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数字图书馆在建设过程中也不断遭遇版权纠纷。自 2002 年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这一国内数字图书馆侵犯版权第一案至今，仅在北京地区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版权诉讼已过百起。Google Library 项目自启动以来，被提起的版权诉讼就接连不断，还曾因此一度中止。可见，数字图书馆如今面临着重重困难：数字图书馆要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必须以海量的作品作为其内容支撑，而海量作品背后隐藏的是海量的作者和版权人，要获得海量作者的一一授权绝非易事。版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进程。

1.1.2 课题研究的目的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数字图书馆并未获得与传统图书馆等同的权利例外，版权授权可适用的规定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和立法空白，数字图书馆一不小心就会侵犯版权人利益，引发版权纠纷，这极大限制和束缚了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壮大。如果数字图书馆能够以经济、便捷的方式获得权利人对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各种权利的授权，一切版权纠纷也将不复存在。可见，版权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图书馆发展的瓶颈，在所有的版权问题中，版权授权是版权纠纷发生的症结所在，而对于授权模式的合理构建和选择则直接影响着数字图书馆的授权效率。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目前存在以及尚处于理论探索中的各种授权模式的分析比较，整合出一种高效、经济的授权模式。

1.1.3 课题研究的意义

作为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数字图书馆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国与国之间资源争夺的一个关键领域。对于关系数字图书馆建设成败的版权授权模式的课题研究，一方面，可以在理论上丰富现有数字图书馆版权理论体系，深化学术界对授权模式的认识，厘清各种授权模式的优势和不足，为新的授权模式的探索提供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认真研究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所涉及的著作权问题，针对不同权利类型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版权授权模式，对于扫清数字图书馆的版权障碍、推动数字图书馆建设、加强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2.1 国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数字技术对版权的巨大冲击，使得各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体现出“强化”的趋势。在国际法方面，1996 年 12 月《WIPO 版权条约》和《WIPO 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赋予了权利人有权控制作品通过网络传播的新权利，从而对数字作品的复制和使用做出了有利版权人的相应规定。1998 年，美国通过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规定了数字化信息的版权保护和使用的的问题，也强化了对网络版权的保护。

在美国，数字版权应该得到版权人的授权，才能进行商业性的使用，是立法所确定的。商业传媒在获取授权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利，只能与作者或者代表作者的各类代理机构签订作品的授权合同。集体许可是数字环境下自愿许可的主要方式，并且这种“集体许可”的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欧盟委员会有关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在互联网上播放音乐的“一站式许可”即这种精神的体现。美国和英国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为解决作品数字化所遇到的著作权许可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获得许可的主要方式是出版商或者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个别项目或一揽子许可合同。

数字环境下欧盟的指令和各国立法，或多或少地偏向于权利人。在面临作品使用的授权及补偿费用可能受到数字环境影响的情况下，欧盟立法者适时地结合新技术的特点，对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在欧盟及欧洲各国的立法中都有所体现；特别突出的是德国，要求对于新的数字复制技术和相关复录载体，必须与规定强制补偿措施结合起来。

在数字图书馆领域有重大影响的 Google Library 计划，尽管秉承着尊重版权、平衡利益的原则，但自 2005 年启动以来还是遭遇了大量的版权纠纷。2008 年 10 月，Google 以 1.25 亿美元的代价获得之前存在争议的数百万本图书和图书馆文件的版权，与美国出版商终于就版权问题达成和解，初步扫清了版权障碍。2009 年 9 月，根据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发布的消息，570 位中国权利人的 17 922 部图书在谷歌的数字图书馆计划之内，而权利人未获得任何报酬。随即，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表权利人与谷歌之间进行了多次会谈，但至今未达成协议。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张洪波干事认为，“面对海量的作品，取得所有收录版权作品的授权需要巨大的人力、财力及时间上的支出成本”，但他也认为，

这不能成为数字图书馆侵权的理由，无论是传统出版物还是数字出版物，其版权都应在我国相关法律和国际版权公约的框架内得到保护，任何使用者都应遵循“先授权后使用”的基本原则。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数字图书馆解决版权问题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循，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授权上来。

国外对数字图书馆授权问题的理论研究则非常注重结合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来寻求相应的版权问题解决方案。例如，有的学者针对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授权问题进行研究，如 Eschenfelder^①在其论文《每个图书馆的噩梦？数字版权管理和经营许可的数字资源》中，将 TPM（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技术保护措施）按照使用限制性质的不同分为软 TPM（劝阻使用）和硬 TPM（严格限制或禁止使用），认为图书馆在订购学术资源时主要面临的是软 TPM，并在此基础上对软 TPM 进行了重点研究；有的学者则对获取停印图书的数字化版本涉及的版权授权问题加以研究，如 Francoise V^②在其《给予停印图书以新生：当出版社与图书馆志趣相投时》一文，就布鲁塞尔大学图书馆和布鲁塞尔大学出版社对停印图书的版权问题达成协议，以及布鲁塞尔大学出版社和作者签订的新的协议进行了肯定，认为这种授权协议是一种使作者、公众、出版社共赢的模式。在特殊人群获取数字资源的授权问题上，Roos.J.W^③指出，在许多发达国家，一些豁免已经在为盲人提供服务的图书馆中适用，这些图书馆与出版界在相关领域达成合

① Eschenfelder. K. R. Every Library's Nightmare?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and Licensed Scholarly Digital Resources[R/OL]. [2008-08-15]. http://dlist.sir.arizona.edu/1803/01/everylibrarynightmare_tpm1.pdf.

② Francoise Vandooren, Cécile. Giving New Life to Out-Of-Print Books: When Publishers' and Libraries' Interests Meet[J]. Learned Publishing, 2008 (3): 1-5.

③ Roos. J. W. Libraries for the Blind as Accessible Content Publishers: Copyright and Related Issues[J]. Library Trends, 2007 (4): 879-916.

作协议，制定相关的标准和定义权限。在电子学位论文获取涉及的授权问题上，美国麻省大学的医学院 Lamar Soutter 图书馆通过与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签署著作权协议来解决论文数字化的版权问题，而意大利则通过自由开放获取工作组（Open Access Working Group）主办、意大利大学的校长会议（Conference of the Rectors of the Italian Universities）赞助的项目来施行开放式授权。

1.2.2 国内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进程中版权纠纷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2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这一国内数字图书馆侵犯版权第一案至今，仅在北京地区有关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诉讼已过百起。在已审结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中，除了原、被告双方自行和解而结案外，法院无一例外地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数字图书馆建设实践产生的大量版权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对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广泛探讨，论文数量可观，其中不乏对授权问题的关注。

有的学者对数字环境下普遍适用的版权授权方式进行了专门研究。2004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平知识产权研究室受中国版权协会和科技部委托对数字环境下版权授权问题进行研究，该课题研究成果《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授权方式研究报告》^①为我国数字行业快速获得合法授权寻找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数字产业的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授权方式研

① 张平. 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授权方式研究报告[R]. 2004-07-22. <http://stlaw.pku.edu.cn/showjiu.asp?id=737>.

究》^①一文，认为授权要约是数字环境下版权授权方式的有利模式，权利管理信息与集体管理制度相结合，才能实现授权要约模式在数字时代的充分发展，这种结合是授权要约模式的现实选择，而集体管理则是完善“授权要约”的武器。

有的学者则针对版权作品的不同形式对其授权方式加以探索，如陈秀钦和傅文奇在《论图书全文数据库版权授权的获得》^②一文中，分析了图书全文数据库涉及的版权归属问题，提出了图书全文数据库制作者取得版权授权的途径和策略；在《论期刊全文数据库版权授权的获得》^③中，分析了期刊全文数据库涉及的版权归属问题，提出了期刊全文数据库制作者取得版权授权的途径和注意事项。

也有众多学者考虑数字图书馆的特殊性，对其适用的版权授权方式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周淑云在《从法学家与数字图书馆版权之诉看我国数字图书产业的版权授权》^④一文中认为，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焦点在于如何取得权利人的版权授权。并认为，在直接授权、代理授权、法定授权、要约授权等多种版权授权模式中，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交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统一管理的代理授权是最理想的版权授权模式。刘志刚在《数字时代版权授权方式比较研究与图书馆适用》^⑤中对数字时代下的几种版权授权方式，即合理使用与许可使用、授权要约模式、版权补偿金制度、交叉许可模式、集体管理制度等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图书馆为适应版权作品，尤其是数字作品

① 杨蓉. 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授权方式研究[D].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08.

② 陈秀钦, 傅文奇. 论图书全文数据库版权授权的获得[J]. 图书馆学研究, 2007 (6): 90-91, 95.

③ 陈秀钦, 傅文奇. 论期刊全文数据库版权授权的获得[J]. 情报探索, 2007 (9): 65-67.

④ 周淑云. 从法学家与数字图书馆版权之诉看我国数字图书产业的版权授权[J]. 情报资料工作, 2006 (2).

⑤ 刘志刚. 数字时代版权授权方式比较研究与图书馆适用[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 (8): 91-95, 116.

的海量授权需要适用的授权方式，并进一步指出集体管理制度是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中的核心制度。《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问题研究》^①在对我国数字图书馆获得版权许可主要采取的方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授权是数字图书馆解决版权问题的最佳途径。《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研究》^②中将“完善数字图书馆授权许可机制”作为完善数字图书馆版权制度的一个方面提出，并进一步认为集体授权是数字图书馆解决版权授权的最佳途径。《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使用制度研究》^③则仅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授权要约、版权补偿金、版权代理和开放存取 5 种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授权方式进行了简要分析。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对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方式的研究比较注重结合数字图书馆建设和服务实践，针对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涉及的不同权利客体的授权模式分别进行讨论。而国内有关数字版权授权模式的学术研究则十分匮乏，针对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的研究就更为薄弱，少有的研究成果也只是将研究视角局限在某种单一授权模式在数字图书馆中的适用性，针对数字版权纠纷提出的各种授权模式各持己见、自圆其说，显得分散、空洞。数字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中扮演着作品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等多重身份，在该过程涉及的版权问题也有所不同，因此，数字图书馆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授权模式来解决所有的版权问题，而需要多种授

① 高琳.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问题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05.

② 刘晓婷. 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研究[D].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2007.

③ 孙明.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使用制度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7.

权模式的综合运用。国内虽有学者已认识到此问题，如《基于适度保护原则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对策研究》^①一文中，提出以利益平衡为原则健全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管理模式，形成以集体管理制度和版权补偿金制度为核心制度，辅以授权要约模式、交叉许可模式等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管理模式；王杰在《著作权集体管理授权模式与其他授权模式的整合》^②一文中提出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分别同法定许可、授权要约和共同体授权相结合；刘燕在《Google Library 版权政策的思考》^③一文中也通过 Google Library 版权问题解决的经验，提出应“采用多元化的版权利用模式”来弱化法律对数字图书馆建设进程的阻碍。但遗憾的是，已有文献就如何将各种授权模式具体应用于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并未深入下去，因此缺乏可操作性。本课题的研究正是为弥补该方面的不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各个环节涉及的不同版权类型着手，分别探讨其适用的相应授权模式，将各种授权模式整合于数字图书馆建设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以期对数字图书馆版权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最终促进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著作研究的主要内容：挖掘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公益性数

① 许波. 基于适度保护原则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对策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07.

② 王杰. 著作权集体管理授权模式与其他授权模式的整合[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4): 160-162.

③ 刘燕. Google Library 版权政策的思考[J]. 情报科学, 2009(1): 57-59.

字图书馆作为网络传播主体的特殊网络传播价值所在；对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行定位；探究数字图书馆遭遇版权纠纷的根源，找出解决版权问题的关键；通过对国内外热烈讨论的各种授权模式的比较，发现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多种授权模式进行整合。

全书分为 7 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 1 章绪论。从分析论文选题的背景入手，阐述了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通过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的梳理，分析了目前该类课题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概述了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指出了论文的创新点。

第 2 章全媒体与数字图书馆发展概述。介绍了全媒体的由来及发展、概念及特点，列举了 4 种典型的全媒体表现形式，并通过对数字图书馆发展脉络的梳理，剖析了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 3 章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法律定位。对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进行剖析，对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行定位，为下文在法律上寻求数字图书馆的权利例外做铺垫。

第 4 章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版权纠纷及其根源分析。对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中最容易出现版权问题的各个环节涉及的相应版权问题进行分析，找到版权纠纷产生的根源，并指出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授权。

第 5 章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的分析与比较研究。对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现有的及尚处于理论探索中的各种授权模式进行梳理，比较分析各种授权模式的长处及不足。

第 6 章全媒体时代面向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版权授权模式的整合。在分析数字图书馆授权模式具有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结合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各个环节构建一种针对不同版权类型分别授权的综合授权模式。

第 7 章版权实践。分析了国家图书馆处理版权问题的实际策略，验证版权授权综合模式的有效性。

最后是结语，在该部分总结了本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1.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利用文献调研法，有效收集和利用各种中西文数据库、专业书籍、期刊及互联网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将国内外现有各种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方式进行详细比较，对各种授权模式优缺点的分析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全面、客观。并通过专家研讨与德尔菲法、调查法、访谈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综合运用来考虑如何将各种授权模式加以整合，并采用案例分析法进一步考察整合后的授权模式在实践中的可行性。

1.4 本研究的预期创新点

本研究预期的创新点包括：

一是对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进行挖掘；

►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研究

二是对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行定位；

三是从权利分解角度设计将全媒体时代的各种授权模式整合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各具体环节中。

1.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分析了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此基础上，综观国内外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针对目前对该课题中存在的不足，找到本课题研究的切入点和研究视角，并对课题研究过程中可能采用的主要方法及内容加以阐述，在此基础上指出本课题研究的创新和独到之处。

第 2 章

全媒体与数字图书馆 发展概述

“全媒体”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热词，如全媒体时代、全媒体营销、全媒体出版、全媒体报道、全媒体战略、全媒体记者、全媒体广告等冠以“全媒体”这一关键词的用语在网络、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等中频频出现。那么，全媒体是如何产生的呢？其概念和特点是什么？主要表现形式有哪些？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图书馆的发展又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2.1 全媒体的由来及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的形式和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拓展。从 15 世纪到 17 世纪依托于欧洲跨海远洋活动出现的报纸，到 19 世纪中叶出现的电报和电话，再到 20 世纪初快速发展的无线电广播、电视，直至今今天信息传播步入数字时代，人类用以传递和交流信息的媒介形式日益增多，传播效率明显提高，传播效果更加立体化、多元化。媒体形式的不断变化，媒体内容、渠道、功能层面的融合，使得人们在使用媒体的概念时需要意义涵盖更广的词语，“全媒体”这一概念在此背景下得以提出并被广泛

适用。

全媒体, 对应英文为 “omnimedia”。在国外, “omnimedia” 这个词最早源于一家名叫玛莎-斯图尔特的家政公司。1999 年 10 月 19 日, 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 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 (MSO) 成立。该公司拥有并管理多种媒体, 包括 4 种核心杂志、34 种书籍、一栏荣获艾美奖的艺术电视节目、一栏在 CBS 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周刊节目 This Morning。不仅如此, MSO 还管理一个名为 AskMartha 的报纸专栏 (其内容提供给 230 多家报纸)、一个在美国 330 多家广播台播出的节目、一个拥有 17 万注册用户的网站 www.marthastewart.com。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是美国当时最有名的家政公司之一, 它通过旗下的“全媒体”传播自身的家政服务和产品^①。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 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的“全媒体”显然并不全, 尚未涵盖像手机电视、户外电视等当今新的媒介形态, 它的真正含义更接近“多媒体”(multimedia)。

通过对 EBSCO、Elsevier 等外文数据库的检索发现, Omnimedia 更多的是作为上述公司的专有名词出现, 但在同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中也不乏其他含义。Udo Jung 在 1997 年 6 月于 Nancy 举办的以如何利用媒体技术来促进学习和教学为主题的 CETaLL (Commision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Language Learning) 会议论文中首次使用了 omnimedia 一词, 他创编该词用以表达“多媒体、超媒体及其他各类新旧媒体的交错融合”这一观点。可见, 在国外, 全媒体并非作为新闻传播学术语而是应语言教学技术领域的需求而出现的一个新词。但从该文的引用情况来看, 此文并未引起国外学者对全媒体的关注, 相关研究成果较小。

① 罗鑫. 什么是“全媒体”[J]. 中国记者, 2010 (3): 82-83.

在国内,“全媒体”这一概念的兴起源于我国出版界和传媒界的应用层面,并逐渐作为国家的文化发展策略被提出。2006年9月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和2007年11月发布的《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都指出,需要建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该工程包括全媒体资源服务平台、全媒体经营管理技术支撑平台、全媒体应用整合平台等项目^①,以此推动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新闻出版业的生产、管理和传播方式,建设数字出版综合业务平台,提升出版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构建国家全媒体发展战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新闻出版行业围绕全媒体进行了积极的创新和实践,电视、广播、出版等行业纷纷呈现全媒体发展态势。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的转播采取“全媒体”对外传播,手机电视成为重要的传播形式,而中国广播网也以全媒体形式实现了广播频率、门户网站、有线数字广播电视、手机广播电视、平面媒体5大终端的融合;出版行业上,2008年12月,“中文在线”联合长江文艺出版社以传统纸质图书、互联网、手持阅读器、手机和贺岁电影等方式推出《非诚勿扰》的5路传播格局,开创了中国全媒体出版先河,并由此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全媒体出版热潮。国内对全媒体的理论研究也较早。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发现,早在1994年发表的《B-ISDN多媒体工作站体系结构》一文中就提及了“全媒体”一词,但文中的“全媒体”只是作为“多媒体”的一种替代表达一带而过,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全媒体相差甚远。而《彩电科技新趋势——从多媒体到全媒体,从模拟数字到全数字》(1998)一文,则较为具体地表达了包含各类媒体在内的全媒体概念。鉴于此,这应该算作国内研究全媒体的开端。此后几年里,相关成果并不多见。而自2008年,在全媒体实践层面的带动下,学术界对全媒体给予了广泛关注,并产生了丰硕

① 王庚年. 全媒体技术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

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学科领域跨度较广,以新闻传媒为主,还涵盖了出版、高等教育、图书情报、电信技术、贸易经济、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等众多学科。至此,全媒体已成为一个被各行各业广为接受的发展理念和运营模式。

2.2 全媒体的概念及特点

2.2.1 全媒体的概念

从全媒体的由来,不难看出,“全媒体”这一概念是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以往的多媒体、超媒体等概念和实践应用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媒介形态。与业界实践的积极探索相呼应,学术界也从不同角度对全媒体的概念纷纷加以界定,总体上形成了如下代表性观点。

一种是媒介运营说,该观点认为全媒体是一种媒体运作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①认为,全媒体是指一种新闻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另一种是媒介形态说,如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周洋^②认为,全媒体是指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如文、图、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武汉大学新闻系的罗鑫^③也赞同周洋的观点,认为“传播形态说”更符合“全媒体”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媒体”的概念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全媒体”

① 彭兰. 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J]. 新闻与写作, 2009 (7): 18-21.

② 李敬坡, 周洋. 打造全媒体时代的核心竞争力[J]. 军事记者, 2009 (11): 22-23.

③ 罗鑫. 什么是“全媒体”[J]. 中国记者, 2010 (3): 82-83.

是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此外，还有学者^①提出了媒介整合说、媒介营销说等观点，媒介整合说认为全媒体就是全部媒体的综合，而媒介营销说则认为全媒体是一种全新的媒介营销理念。

综上所述，学界对全媒体的见解可谓见仁见智，对全媒体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对全媒体概念的不同定义有助于人们从广义上全面认识全媒体。下面，笔者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全媒体。

全媒体，在英文中为“Omnimedia”，为前缀“omni-”（全）和单词“media”（媒体）构成的合成词，从字面意思理解，全媒体即全部的媒体。那么何为媒体呢？媒体（media），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edius”，音译为媒介，意为两者之间，是指人借助用来传递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工具、渠道、载体、中介物或技术手段。与之相应，对全媒体界定如下。

全媒体是指人借助用来传递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各类工具、渠道、载体、中介物或技术手段的统称。具体而言，全媒体的概念应涵盖以下5个方面：一是媒介信息传播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不同媒体表现手段（手段融合）；二是利用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报纸、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形态融合）；三是通过融合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进行传播（载体融合）；四是最终实现用户以电视、计算机、手机等多种终端均可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终端融合）；五是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获得任何想要的信息（5W）。

① 姚君喜，刘春娟.“全媒体”概念辨析[J].当代传播（中文版），2010（6）：13-16.

2.2.2 全媒体的特点

通过上述对全媒体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全媒体概念所包含的不仅是一种运营模式、媒介形态,而且是一种全新的信息生产方式,一种全新的传播观念、营销观念。这使得全媒体体现出如下特点。

(1) 融合性。显而易见,融合性是全媒体最为显著的特点,融合体现在全媒体的方方面面,例如,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的融合;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形态与网站、手机等新媒体形态的融合;全媒体所依赖的物理载体的网络融合,计算机、电视、手机等多终端的融合等。此外,全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运营模式,必然带来新旧观念的融合,各类集成技术的融合,人力物力资源的融合。可以说,全媒体是一种全方位的融合,包括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乃至通信的全面互动、网络媒体之间的全面互补、网络媒体的自身的全面互融。

(2) 系统性。全媒体并不排斥传统媒体的单一表现形式,而且在整合运用各媒体表现形式的同时仍然很看重传统媒体的单一表现形式,并视单一形式为“全媒体”中“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全媒体”体现的不是“跨媒体”时代的媒体间的简单连接,而是对不同媒体的有机整合。此外,不同媒体表现手段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彼此独立的。总之,全媒体的融合是系统有序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全媒体的价值。

(3) 交互性。全媒体涵盖了网络、手机等媒体形式,这便为受众的参与提供了广阔的交互空间。全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功能局限,将以往的受众由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变为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使其明显区别于

以往的传统媒体,实现了传播状态由“一点对多点”到“多点对多点”的转变,受众状态由“普通大众型”到“细分受众型”的转变,主导状态由“主导受众型”到“受众主导型”的转变。可见,全媒体的交互性使得媒体的个性化更为突出,受众选择性增多,明显提升了用户体验。

(4) 开放性。全媒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一模式,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理想状态,“全媒体”应是覆盖面最全、技术手段最全、媒介载体最全、受众传播面最全的一种媒体形态,但实际上,全媒体的发展会受到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限制。当互联网普及时,博客、播客等媒体形态盛极一时,当手机普及时,微信等应用又受到众人追捧。因此,全媒体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兼容并蓄的媒体形态,随着科技的进步其内涵和形式会不断丰富。

2.3 全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

全媒体作为媒体走向融合后的产物,随着新技术的产生而迅速发展,一方面,新的传播手段和新的媒体产品的出现将会不断丰富“全媒体”中“全”的内涵;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分界线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无论是纸质媒体、广电媒体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手机媒体,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兼容并包的融合状态。鉴于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大众已耳熟能详,这里,我们仅列举几种明显区别于以上传统媒体的新型全媒体形态。

2.3.1 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又称互联网媒体,就是借助国际互联网这个信息传播平台,

以计算机、电视以及移动电话等为终端，以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形式来传播新闻信息的一种数字化、多媒体的传播媒介。网络媒体相对于早已诞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而言，被称为“第四媒体”。

相比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具有较大优势。首先，网络媒体传播的时空范围更为广泛。理论上讲，信息一经发布在互联网上，那么分布在全球近 200 个国家的互联网用户都可以同时在自己的计算机上看到，并且这些信息可以一天 24 小时、一年 365 天不间断地在网上呈现或检索。网络媒体信息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真正实现全天候、全球性的全面的信息覆盖。其次，网络媒体传播更为迅捷。网络媒体信息来源广泛，制作发布操作简便，并可以随时发布，实时传播，因此，网络媒体在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方面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再次，网络媒体带来了双向互动传播。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曾形象地描述数字化带给大众媒体的这种变化是“‘推’（pushing）送比特给人们”到“允许大家（或他们的计算机）‘拉’（pulling）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这是一个剧烈的变化，因为我们以往媒体的整个概念是，通过层层过滤之后，把信息和娱乐简化为一套“要闻”或“畅销书”，再抛给不同的“受众”。由“推”到“拉”不仅仅是一个动作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把网上信息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信息超级市场”，网民在其中可按自己意愿各取所需。网络媒体赋予了网民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也迎来了更多网民的支持和信赖。

我国自 1994 年接入互联网以来，各类网络新闻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我国的网民人数也在不断攀升。据 2017 年 8 月 4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①（以下简

^① CNNIC. 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bzg/>. 2017-8-3.

称“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站(指域名注册者在中国境内的网站)总数为506万个,半年增长4.8%,“.CN”下网站数为270万个,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半年增长率为2.7%,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较2016年年底提升1.1个百分点,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我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26.5小时,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6.25亿,网民使用比例为83.1%,互联网新闻已成为网民高频使用的基础类网络应用。

2.3.2 移动数字媒体

所谓移动数字媒体,是指以移动数字终端为载体,通过无线数字技术与移动数字处理技术应用,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展示信息和提供信息处理功能的媒介。目前,移动数字媒体的主要载体以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为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通信网络的融合,一切能够借助移动通信网络沟通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终端都可以作为移动媒体的运用平台,如电子阅读器、移动影院、数码摄录像机等都可以纳入移动数字媒体范畴。相较而言,手机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移动数字媒体最为活跃和主要的载体形式。

据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较2016年年底增加2830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6年年底的95.1%提升至96.3%,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5.96亿,占手机网民的82.4%,半年增长率为4.4%。手机上网比例持续提升,各类手机应用的用户规模不断上升,场景更加丰富。移动数字媒体除承担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外,也在不断向生活、娱乐等领域渗透。2017年,网络娱乐类应用进一步向移动

端转移,手机网络音乐、视频、游戏、文学用户规模增长率均在4%以上,其中,手机网络游戏增长率达到9.6%以上。手机即时通信的互联网应用率最高,网民使用率达到了92.3%,手机网络新闻和手机搜索的网民使用率也分别达到了82.4%和81.9%,手机网络音乐、手机网络视频、手机网络游戏、手机网络文学等娱乐类手机互联网应用均占有较大比例,其他诸如手机网上支付、手机网上购物、手机地图、手机网上银行、手机旅行预订、手机网上订外卖等生活类手机互联网应用也开始占有一定比例。此外,中国网民通过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分别为55%、36.5%、28.7%,较2016年年底分别下降了5.1、0.3和2.8个百分点。可见,手机作为移动数字媒体的主要形式日渐承载越来越重要和广泛的媒体功能。

2.3.3 互联网电视

互联网电视,也称网络电视,是以宽带网络为载体,以音、视频等多媒体为形式,以互动个性化为特性,为所有宽带终端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种交互式服务的崭新技术。在行业界,也有将互联网电视称为“IPTV”(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交互式网络电视)或OTT TV的说法,这里的OTT是“Over The Top”的缩写,原本是篮球术语“过顶传球”,这里借用到通信领域是指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的各种应用服务。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应用和目前运营商所提供的通信业务不同,它仅利用运营商的网络,而服务由运营商之外的第三方提供。目前,典型的OTT业务有互联网电视、苹果应用商店等。

互联网电视作为互联网络技术与电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既保留了电视

形象直观、生动灵活的表现特点，又具有了互联网按需获取的交互特征，是综合两种传播媒介优势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其服务终端既可以是个人计算机（PC），也可以是与 DMA（Digital Media Adapter，数字式媒介适配器）连接的模拟电视机。

相比传统电视，互联网电视有诸多优势。其一，内容上更为丰富。互联网电视彻底改变了传统电视的功能和人们看电视的行为，除了能提供传统信号源内容之外，还能提供目前基于 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计算机）端和移动端的所有应用，如视频点播、健身、结算、购物、实时天气查询、股票查询等，此外，还有其独特的应用，如体感游戏等。其二，个性化更为突出。使用互联网电视的点播业务，用户可以不受时间限制，根据自己的兴趣点播个人喜欢的电视节目，并通过拖曳等方式来观看节目内容。此外，还可以非常灵活地实现节目预约、快进、快退等多种功能，更好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其三，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统的有线电视、数字电视都是局限于各个本地有线电视网内，而互联网电视是依托于互联网的，其内容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播，因此观众遍布全球。其四，与受众的交互性更强。有线数字电视的网络介质大部分是单向 HFC 网，只有少部分为双向网，互动性不强。而互联网电视的媒介是互联网，开放性和双向性是互联网的根本特征，因此，网络电视具有与生俱来的超强的互动性。

目前，互联网电视正在发展成为家庭娱乐智能终端，随着智能家居行业的快速发展，智能电视作为家庭娱乐设备的上网功能将进一步显现。据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国内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达到 26.7%，可以预见，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互联网电视都将成为全媒体时代一种颇为重要的媒体形态存在。

2.3.4 社会化媒体

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也称社交媒体、社会性媒体,这个术语是 Antony Mayfield 在其《什么是社会化媒体》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将社会化媒体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①。该定义突出了社会化媒体的核心是用户参与。关于什么是社会化媒体,很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概念表述,笔者比较认同的是如下定义:“以 Web 2.0 的技术与理念为基础的,允许互联网用户进行用户生成内容创作和交流的互联网应用的集合。”^②该定义强化了社会化媒体存在的基础包括三部分,即用户、用户生成内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 及网络应用。社会化媒体能够以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目前,最常见的社会化媒体有博客、微博、播客、论坛、维基、社交网络、内容社区和即时通信几种基本形式。具体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常见社会化媒体一览表

类 型	国 内 代 表	国 外 代 表
博客 (Blog)	新浪博客	Wordpress、Blogger
微博 (Micro blog)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	Twitter
视频分享	土豆网、酷 6 网、优酷网	YouTube
图片分享	巴巴变	Flickr
音乐分享	虾米网	last.fm 和 web.jay
论坛/论坛聚合	天涯社区、猫扑、百度贴吧	Big Boards
百科	百度、搜搜、互动百科	Wiki
问答	百度知道、搜搜问问	Answers
社交网络 (SNS)	人人网、开心网	Facebook
即时通信	QQ、微信、飞信、旺旺	MSN

① Mayfield A. 什么是社会化媒体[M]. Spannerworks, 2008.

② Kaplan A M, Haenlein M.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J]. Business horizons, 2010 (1): 59-68.

社会化媒体具有如下特性。

(1) 用户主导性。社会化媒体以用户为中心，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大量聚集且具有社会交互通道的用户、UGC 以及用户的分享行为。社会化媒体激发感兴趣的用户主动地贡献、反馈和分享信息，用户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传播利用过程中拥有主动性和绝对的主导权。

(2) 交互性。社会化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内容由媒体到用户单向流动的“广播式”传播形式，以其开放的态度支持用户参与信息资源的创作和传播。其内容在媒体和用户之间双向传播，形成互动交流。

(3) 融合性。社会化媒体具有较强的融合性，这体现在：内容上，可以整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类型媒体；形式上，则既可以实现不同社会化媒体间的融合，也可以实现和其他网络媒体的融合。

(4) 社会性。在社会化媒体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兴趣等结交不同的用户，构成一个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社会化媒体加强了用户间的社会联系，是具有黏性和“人情味”的“社会性”的媒体。

分享是社会化媒体的重要运作机制，分享和资源共享的理念相契合，因此，社会化媒体可以作为资源共享的一种新方式。社会化媒体的诸多特性使其在资源共享方面更具优势：首先，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主导性会激励广泛的创作群体生产更多更好可共享的信息资源；其次，社会化媒体的融合性和社会性会极大延伸资源共享的广度；最后，社会化媒体的交互性可以及时反馈和校验资源共享的效果，提高资源共享的效率。社会化媒体给予了资源共享巨大的便利，但同时也为信息版权保护埋下了不利的伏笔。

2.4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是用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各种图文并茂文献的图书馆，其实质是一种多媒体制作的分布式信息系统。显而易见，依托于信息技术产生的数字图书馆将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加快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步伐，为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技术、人员、版权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2.4.1 数字图书馆发展概况

1. 国外概况

国外数字图书馆建设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①。1985 年，西班牙文化部 IBM Spain 和 Ramón Areces 基金会共同组建的一个联合小组着手于 AGI(EI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数字图书馆建设，目标是建立一个对所有历史档案具有集成功能的计算机系统。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不惜斥巨资开始大规模研制和建设数字图书馆。1993 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同年提出了一系列由政府出资支持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计划项目。1994 年 9 月，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防部高级研究署(ARPA)联合发起《数字图书馆倡议》，投资 2 400 万美元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在近年内把该馆以及全国所有

① 曹学柱，秦莲霞，孟遂珍. 国外数字图书馆发展概况[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1）：67-68.

公共图书馆的藏书等转化为数字形式储存起来。”该计划主要着眼于图书资料制成高质量的数字化图像所需的技术上,使其能在网络中高速传输。由法、日、美、英、德、加、意、俄8个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参加的“G8全球信息社会电子图书馆”项目于2000年建成。此外,较有代表性的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还有许多,如日本政府斥资4亿美元兴建的“日本国会图书馆关西馆工程”、法国的“国家图书馆数字化工程”、英国的“国家图书馆存储创新倡议”、俄罗斯的“往事项目”和“电子图书馆项目”、德国政府出资6000万马克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字图书馆发展进程中,不仅有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也吸引了企业界的关注。2004年,谷歌公司寻求与图书馆和出版商合作建立谷歌数字图书馆,计划将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数百万册图书扫描上网,打造世界最大的数字图书馆。

2. 国内概况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数字图书馆的研发工作,一批国家级、省市级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相继启动并完成^①。由文化部主持的、国家计委于1997年批准立项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CPDLP)于2001年5月通过专家鉴定。1998年8月,由文化部牵头,联合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及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成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筹备小组,并于2000年4月正式启动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该工程列入我国863计划,对数字图书馆涉及的技术、法律、管理、运营、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2003年1月,国家“十五”重点文化工程建设项目、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经批复启动,并于2008年9月完成。国家级的数字图书

^① 赖宁,蒋飞云.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状况及趋势研究[J].现代情报,2006(6):94-97.

馆项目还有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教育部数字图书馆计划等,此外,广东省、江苏省、辽宁省、邯郸市等一些省市也纷纷进行了数字图书馆建设。总体而言,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方兴未艾,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通过对国内外数字图书馆发展状况的梳理,我们发现,数字图书馆建设之初其内涵更接近于数字化的图书馆,工作的重心在于对纸质文献的数字化,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数字化文献。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更是极大丰富了数字图书馆的资源类型及其传播形式,国内多家图书馆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2010年,国家图书馆启动全媒体服务工程。在“十二五”期间,将以国家数字图书馆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以技术手段使全国分散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联结为一个超大型数字图书馆,并将跟进以手机、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协同发展,服务范围将覆盖互联网、电子政务外网、卫星、移动通信网、数字电视网等,最终实现全国每个机构、每个家庭、每个公众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数字图书馆^①。

到“十二五”末,实现全媒体服务。杭州数字图书馆也是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典范。杭州数字图书馆“文澜在线”创造性地开拓了图书馆通过网络、手机、电视等全媒体传播渠道提供多终端、全时空服务的新模式,特别是电视服务终端的推出在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尚属首例,是国内首家实现三网融合、三平台运行的数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也通过“城市中心图书馆建设”完成了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社会空间融为一体的服务形态转变,通过“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上海之窗”、电子剪报服务、手机图书馆服务、手

① 周玮. 实现自己的数图——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启动[OL]. [2010-12-15]. http://www.gov.cn/jrzg/2010-12/15/content_1766350.html.

持阅读器借阅等服务形式的创新,收藏全媒体资源,极力将图书馆打造为全媒体环境下的复合型知识空间。诚如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先生所言,要加快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必须加快建设分级分布的国家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全媒体”数字图书馆网络体系;加快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开放式信息服务平台^①。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将大有作为。

2.4.2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机遇

原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在《世博启示录》中说:“托马斯·库恩把新老两个模式的转换叫作范式转换,范式转换指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不是单纯的相加或减少。今天,图书馆正处在范式转换进程中,正在从一个纸质媒体时代进入一个全媒体时代。这两种模式的图书馆之间不只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根本变化^②。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为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发展机遇。

1. 丰富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类型

全媒体时代,图书馆所提供的资源形态更加多元立体化。对同一信息需求的服务中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不同载体,全时段、宽用户、立体化地进行信息服务,共同建构一种全景化的立体服务格局。全媒体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中,既有文本的摘要,也有图表的示例,还有音频、视频等的场景再现。例如,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图书馆不仅保存了国际展览局的大量纸质图书、杂志、报告、档案,还保存了大量照片、实物、模型、广告、证章、票券、视频,并积极搜索、保存网上的博客等有关世博会的所有知识信息。

① 张芳宁.“全媒体”视野下图书馆服务的未来[J].情报资料工作,2011(4):73-75.

② 吴建中.世博启示录[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2. 拓宽数字图书馆的信息传播渠道

全媒体时代图书馆将通过三网融合和多载体聚合服务实现多样化的信息传播。从传播工具上看,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络、电信、卫星通信、手机、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等;从传播技术的支持平台来看,除了传统的纸质、声像外,还有基于互联网络和电信的 WAP、GSM、CDMA、GPRS、3G、4G 及流媒体技术等^①。全媒体时代的数字图书馆通过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可以明显降低信息传播成本,扩大信息传播的覆盖面,提高信息传播效率。

3. 满足受众的个性化信息服务需求

从服务内容上来看,全媒体时代的数字图书馆整体上表现为大而全,而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则表现为超细分的个性化服务。全媒体时代的数字图书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习惯来选择资源类型、服务时间、服务地点,也可以根据偏好及客观条件选择手机、电视、计算机等不同载体来利用数字图书馆的各类资源。全媒体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为用户提供适合的接收信息方式,更好地满足了用户个性化服务的需求。

4. 提升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效果

一方面,全媒体吸收了手机、网络等的互动性优势,使信息的传受双方互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这种实时、快捷、共创、共享的信息交流模式,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信息服务体验,有助于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和参与。另一方面,全媒体服务强调对信息资源的同一发布,这意味着同一信息内容在

^① 朱以彬. 试析全媒体环境下的图书馆泛在化服务[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4 (8): 29-32.

不同载体的多维呈现，由数字电视、移动终端、网络整合而成的全媒体数字图书馆平台将为用户提供开放、便捷、触手可及的多样化资源，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多途径享受图书馆的服务。此外，它还融合了视、听、光、形象、触觉、互动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这也将大大增强其服务效果。

2.4.3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发展面临的挑战

全媒体在为数字图书馆带来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1. 技术挑战

媒介的融合得以实现需要以新的科学技术进行支撑，全媒体作为技术融合的产物，从前期的平台搭建到后期的平台维护及使用都涉及各类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例如，数字图书馆的全媒体基础支撑平台建设涉及互联网络、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全媒体技术应用平台涉及多渠道信息采集、全媒体制作、多平台发布、多终端服务、多终端应用、数字版权管理等方面的技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全媒体时代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将与3D影像、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密切相关。正是技术壁垒的存在，使得现阶段不同图书馆的全媒体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较大。要实现全媒体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创新发展，无疑需要克服以上诸多技术难题。

2. 人才挑战

媒体融合对图书馆馆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媒体环境下，图书馆进行资源建设和服务提供不仅需要图书情报人才，还需要通信技术、网络技术、

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其他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就要求图书馆要重视各类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同时还要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馆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以应对全媒体时代对图书馆馆员提出的挑战。

3. 版权风险

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类型丰富，信息传播渠道广泛，信息交流快捷生动，但同时，也加大了版权管理的风险。图书馆是否有权将馆藏版权作品进行数字化？图书馆是否有权将数字化的版权作品或其他数字资源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等不同载体形式传播？社会化媒体中的用户生成内容是否享有版权？图书馆可否对基于其平台产生的社会化媒体中的用户生成内容加以开发利用？可见，全媒体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面对一系列版权问题有待厘清。众所周知，版权问题如若处理不好，极易引起版权纠纷。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起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到 Google 数字图书馆版权争议，单纯的版权作品的数字化及其网络传播即可以引起版权纠纷，更何况在传播媒介更为多样、传播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的今天。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建设面临的版权问题将更为复杂。

2.5 本章小结

本章作为先导性研究，主旨在于明晰全媒体和数字图书馆的相关基础理论及发展脉络。在这一章，首先，介绍了全媒体的由来及发展；其次，对全媒体的概念及特点加以诠释，并进一步枚举了 4 种代表性的全媒体表现形式；最后，在对数字图书馆发展概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剖析了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3章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法律定位

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数字信息资源与日俱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有人提出“图书馆消亡论”，数字图书馆也应运而生。那么，数字图书馆相对于传统图书馆和其他网络信息传播者而言，是否具有更广泛、深刻的社会价值？表现何在？另一方面，在数字图书馆遭遇“授权”瓶颈的今天，我国版权法又该对其做出怎样的规定才能既促进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同时又凸显“公平、正义”的宗旨呢？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定位直接关系到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中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权限认定，因此，在探讨数字图书馆的授权机制前必须首先对上述问题加以明晰。

3.1 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数字图书馆具有多维的社会价值，在《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价值与制约因素分析》^①一文中，就从其发挥职能的社会生活领域、相关

^① 马海群，严雯.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价值与制约因素分析[J]. 图书与情报，2009（1）：51-54.

主体、开发利用环节 3 个角度对其社会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本节,笔者将着重分析数字图书馆作为信息网络传播者,与其他网络运营商相比,所独具的价值。

3.1.1 数字图书馆以天然馆藏为依托,具有更丰富的信息资源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数字化信息资源是数字图书馆的基础和核心,数字图书馆开展的各种业务均是建立在信息资源数字化的基础之上。数字图书馆是在传统图书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现有图书馆已经积累了大量信息资源,图书馆储存的信息历史悠久,储存信息的时间跨度,长则数百年,短则几十年,其内容之丰富,历史之悠久,是其他信息交流机构望尘莫及的。例如,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四库全书》,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又如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申报》,时间跨度从 1872 年到 1949 年,有 78 年的历史。数字图书馆以传统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为基础,与其他信息网络运营商相比,在信息资源数字化方面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目前各国正在进行的数字图书馆建设,都主要由图书馆界在承担,数字图书馆的馆藏内容,可以说将会完全包含传统图书馆原有馆藏中的精华部分。例如,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将要完成“中华文化史资源库”“中国国情资源库”“中国宗教资源库”“中国旅游资源库”“中国医药资源库”等数据库的建设,这些数据库的内容都是传统图书馆馆藏中的精华部分。^①以上充分说明了数字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可以以其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① 吴志荣. 数字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实[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10.

3.1.2 数字图书馆的稳定性是长期保存数字资源、传承文化的保证

诸如 Google 等信息网络运营商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故其生命周期不可控。而数字图书馆既然是依托于传统图书馆成立，其性质自然保持原来的事业单位属性，由国家给予一定扶持，运行的规范和体制等也将由国家加以引导，所以运作相对稳定。收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是传统图书馆所具备的最核心的价值，有人称之为“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数字图书馆作为传统图书馆的继承和发展，可以结合现代化技术将该价值更好地发挥。信息网络运营商虽然也可搜集和储存信息，但作为营利性的私营机构，其运行状态为市场风险所左右，一旦经济不景气，就有破产的可能性，而其所拥有的信息资源也将随之消失。这对于数字资源的保存来说无疑是种损失，所以其固有的特性决定了收集和保存人类数字资源类型的文化遗产的使命必须由数字图书馆来担当。数字图书馆的稳定性是其传承文化的有力保证。

3.1.3 数字图书馆的公益性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

公益性是社会对图书馆性质的基本界定。图书馆的公益性，体现为两个基本点：一是免费；二是平等。图书馆必须敞开大门，不分民族、肤色、国籍、年龄、性别、宗教、语言、地位、学历，面向所有成员免费、公平开放。^①亦即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应定位于公益性，即保障读者自由利用知识信息的公益性。

① 高继明，唐天旭. 论数字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及其体现方式[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32）：39-40.

提升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关键则是维护知识自由,即在现实条件下不受限制地进行知识的自由生产、自由接收、自由传播、自由利用和自由管理活动的状态。^①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促使信息逐渐取代土地和资本等传统资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社会财富的源泉。知识和信息的经济价值的显现,为其作为公共品被自由消耗的时代画上了句号,转而成为企业和组织的资本,成为直接买卖的商品。信息的有偿性在一定程度上为知识的自由获取设置了障碍,存在一种潜在的风险,那就是付得起费用的使用者可以享用更多的信息资源,由此催生更多的经济价值,继而有更大的信息资源获取能力。反之,付不起费用的则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信息资源匮乏,无从挖掘经济利益而保持着原来的状态无法自拔。如此,便会导致数字鸿沟的加剧。数字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的“升级版”,虽然其物质形态和服务方式不同于传统图书馆,但其公益性质却是相通的。数字图书馆所秉承的自由、平等、开放的价值理念和它所坚持的公益性原则,可以有效促进知识的正常获取和信息的无障碍交流,从而缩小数字鸿沟。

3.1.4 数字图书馆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

图书馆储存的信息集阶梯形、系统性和多样性于一身。所谓阶梯形,是根据人们获取知识的一般顺序,图书馆储存的信息囊括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四类,即用于学前教育文献、小学教育的文献,用于中学教育的文献、用于大学教育的文献、用于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文献以及与上述各类相适应的文化娱乐方面的知识或精神产品。人类掌握的知识只能由一类到二类,

① 孙秋菊. 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问题的思考[J]. 黑龙江档案, 2009 (3): 105.

再三类、四类，逐步递升，呈阶梯状态分布。数字图书馆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遵行系统性的原则，将数字化的馆藏资源分门别类，有系统地储存起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形成个别教育、反复教育和需方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功能。诚然，信息网络运营商也可以投眼于该方面，但在传统图书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字图书馆其知识来源更加可靠、知识体系更加完善，所以更容易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从而激发各类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提供学习者的学习能力。

由此可见，数字图书馆与其他信息网络运营商相比，虽然都是以网络为工具为公众提供信息资源，但其资源的丰富性、稳定性、公益性和独具的教育功能都使其有别于信息网络运营商而发挥着特有的社会价值。因此，《版权法》中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认定也应和其他信息网络运营商区别对待，而不是将其等同于一般的信息网络传播者，用同一条文进行规范。

3.2 数字图书馆的特殊法律性质

在《信息网络传播条例》出台前，针对修订稿中的第4条和第6条，图书馆界和出版界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信息网络传播条例》未给数字图书馆以应有的传播者权利，极大地限制了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究其原因，出版界对数字图书馆的误解是该矛盾产生的关键。他们将数字图书馆与网络运营商等营利性信息网络传播相等同，夸大了数字图书馆对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行为对版权人利益的潜在影响。因此，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利用要在法律的框架内顺利开展，我们必须对其法律性质有正确的认识。

3.2.1 公益性和非公益性之争

从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图书馆一直作为公益性服务机构,在促进知识传播的同时兼有保护人类文明的责任。作为为馆内读者提供文献的一种专门机构,传统的图书馆至少应具备公益性、非营利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人们对图书馆的认同也正是定位于其免费共享人类共有知识的层面上。个人对知识的追求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理应受到鼓励,而图书馆恰是提供这种学习与进步必不可少的机构。因此,在我国,传统的图书馆始终作为事业单位,由国家对其投资建设。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信息、情报、知识变得日益重要,这也使得信息资源的价值与日俱增。通过对信息资源的搜集、选择、组织、编排、分析和提供等可以实现信息的增值,由此以信息为作用对象的活动有了盈利的可能性。在利益的驱动下,各类数字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虽然这些以提供文献和信息为服务内容的图书馆称为“数字图书馆”,但笔者认为,它们实质上是数字化信息网络运营商,都以盈利为目的,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和传统图书馆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有本质区别的。

之所以将数字图书馆与其他信息网络运营商加以区分,是因为目前国内有很多数字图书馆借用图书馆之名,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公益机构,另一方面又进行商业化运作。一方面宣称免费服务,另一方面又发售“读书卡”。^①2009年炒得沸沸扬扬的谷歌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中,谷歌也是以“公益性”作为

① 陈传夫,冉从敬.数字图书馆法律属性初探[J].图书馆论坛,2003(6):217-219.

自己的挡箭牌，认为其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对图书的数字化和有限内容传播等行为均属于合理使用。

那么，公益性与非公益性对于数字图书馆的侵权责任认定有多大影响呢？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规定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机构与非公益性机构的区别，也没有规定数字图书馆的业务因公益性与否而产生不同法律效果。另外，TRIPS 协议第 13 条规定合理使用“应将专有权的限制与例外局限于一定特例中，该特例应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显然，TRIPS 协议也没有直接规定公益性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益性与否不能成为考虑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侵权责任的直接因素。

毫无疑问，无论公益性与否，数字图书馆网络传输作品的行为都会给作品的潜在市场价值带来影响，所以数字图书馆不能与传统图书馆追求完全相同的权利例外。但同时，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具有不同于其他商业性数字图书馆的价值所在，这促使我们应为公益性的数字图书馆在法律上寻求一定的豁免空间。不同法律性质的权利主体，将承担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有必要厘清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对数字图书馆的公益性与否进行界定。

3.2.2 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

列宁曾说过：“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拥有多少珍本书，有多少 16 世纪的版本或 10 世纪的手稿，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地流传，吸引了多少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

有多少图书被读者带回家去,有多少儿童来阅读和利用图书馆。”^①这就是说,图书馆的本质在于其公益性。1975年,国际图联(IFLA)在法国里昂召开会议研讨图书馆的职能问题,提出现代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有4项:“一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二是开展社会教育,三是传递科学情报信息,四是开发人类智力资源。”虽然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相比,在物质形态、传播方式、阅读方式、服务方式等很多方面存在质的差别,但作为图书馆,无论其形态和内容发生怎样的变化,它所担负的使命不应有变。图书馆的这种角色定位必须始终如一,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可见,数字图书馆最本质的社会职能便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或非营利性的服务,这是图书馆最重要的社会性公益职能,也是图书馆作为国家文化基础设施的基本理念^②。国际图联在《关于在数字环境下版权问题的立场》中声称:“数字的不是不同的”,并坚持认为,“除非有这样的例外存在,即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及诸如教育和研究等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允许图书馆和公民可以无偿地获取和使用信息。否则,将存在这样的危险,即只有那些承担得起费用的人能够利用信息社会的好处。这将导致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更大”^③。所以,数字图书馆必须延承图书馆的公益属性,为公众平等地获取信息提供服务。在我国学术界,以党跃臣、王锡华、王丽君等为代表的学者也支持该观点,他们认为数字图书馆虽然在收集、存储、整理、加工和传递信息以及开展服务的方式上不同于传统图书馆,但其社会职能和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主体性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② 陶锡良. 数字图书馆职能及相关法律问题初探[J]. 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 (4).

③ 闫冬. 浅析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属性[J]. 法制与社会, 2008 (35): 340.

质仍属“公益性”。^①基于此，必须对数字图书馆的公益性进行法律上的认可，即将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定位于公益性。

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坚持数字图书馆的公益性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非营利性机构不能够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不能够进行产业化运作。这是因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不断更新技术、资源，完全依靠国家和政府投入显然是杯水车薪，因此，它们不得不从事一些商业经营或商业化运作来筹集资金。^②那么该如何调和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和商业性数字图书馆之间的矛盾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林研究员早在几年前曾提出，为了坚持公认的图书馆应有的、不可变更的公益性、非营利性和开放性，不再使用“数字图书馆”一词，以区别于那些数字化信息网络经营商。但笔者认为，图书馆一词由来已久，其公益性普遍为社会所认同。在传统图书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继续沿用“数字图书馆”的称谓很容易获得相同的认知。而非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可以考虑更名为“知识库”或“数据库”，一方面可以依旧体现其服务内容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有别于公益性的数字图书馆。

3.3 数字图书馆的特殊法律地位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环节很多，在不同的环节中数字图书馆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法律上则体现为数字图书馆作为不同的权利主体，

① 周恬. 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侵权问题. 2009 转引自党跃臣等：“试论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情报资料工作，2001（2）：46-48.

② 李明仪.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J]. 黄山学院学报，2009（4）：130-132.

拥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并因此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责任与义务。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3.3.1 信息资源使用者

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现实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和数据库制作；二是虚拟馆藏资源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础，首先是文献的数字化。将原有的存储在物理介质上的图、文、声、像等信息转化为数字信息，这是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重要来源。在信息时代，只有数字化了的信息才能成为网络环境下可利用的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数字化的信息资源为对象进行的。图书馆的现实馆藏中分为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和尚在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 3 类。对于前两者，图书馆可以对其进行数字化、传播等自由利用。但对于尚在保护期内的馆藏版权文献，根据我国《版权法》第 22 条第 8 款规定，图书馆只有出于“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才可以进行复制。版权人享有复制权，受《版权法》保护。而数字化和复制又是什么关系呢？根据 1996 年 12 月日内瓦会议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的条款规定，作品的数字化是涵盖在复制权之中的。WCT 的第 1 条第 4 款规定指出：“《伯尔尼公约》第 9 条意义下的复制权及其所允许的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况。”可见，国际社会对数字化的问题早已有定论，即数字化属于复制。综上所述，数字图书馆对尚处于版权保护期内的馆藏文献，如果不满足以上特定要求，而是单纯地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需要，则无权利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因此，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首先是作为信息资源的使用者，必须向版权人取

得作品的复制权，方可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操作。

数字图书馆的运行要靠大量数字资源的支撑，其中既有从外部获得的数据库、网络出版物等数字资源，也要有自己制作的特色的数据库。^①数字信息资源的庞杂性要求数字图书馆对大量原始数据和信息进行整序、集成和包装，从而生成指南性数据库和元数据库等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对于指南性的数据库，在制作过程中，只要坚持自主开发，一般不会涉及著作权侵权问题。但是，对于源数据库，则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性质，辨别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畴，对于他人拥有著作权且不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的作品，必须首先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即数字图书馆在开发数据库时要处理好在先版权问题。

3.3.2 信息资源传播者

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同时，该条例第7条也对图书馆等公益性机构做出了一定的权利例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

① 肖燕.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与数字图书馆[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经济利益。其中,“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以上条款的规定严格限定了数字图书馆服务内容和对象的范围。这说明,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数字图书馆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行为,事实上是作为一般的信息网络传播者,和条例中提及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等同对待。

3.3.3 信息资源生产者

在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后期,数字图书馆通过对各种数字资源特征的标引,形成指南性数据库。各种指南性数据库在制作完成后,作为编排部分具有独创性的独立作品,不可避免地产生对著作权保护的需求。亦即,数字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生产者对其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邱均平等认为,数字图书馆自主知识产权是指数字图书馆对自己生产的智力成果产品拥有完全自主的所有权和支配权。^①

从近年来的国内外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数据库可以纳入“汇编作品”中。我国《著作权法》(2001)第14条对汇编作品的保护有如下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可见,数字图书馆通过对外部获得的数据库、网络出版物等数字资源进行加工后形成的搜索引擎或门户网站,以及自己制作的有特色的数据库,只要体现了原创性和创新性,数字图书馆

① 陈若兵.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版权问题研究[J]. 东莞理工大学学报, 2008(4): 99-102.

就对其享有汇编权，在版权法体系中享有版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受《版权法》保护。

综上所述，数字图书馆在其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不同环节，以不同的角色作用于信息资源，这使得数字图书馆在版权法体系中融合了版权所有者、版权作品传播者和版权使用人等不同的权利主体地位。作为版权人，数字图书馆需要以经济、便捷的方式授予其权利以发挥版权价值；作为作品的传播者和使用者，数字图书馆也希望通过方便、合理的方式获得版权人的相应权利许可。因此，对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的相关探索，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步伐。

3.4 本章小结

本章在第一节着重分析了数字图书馆与一般的网络运营商相比，作为信息网络传播者所独具的社会价值。在此基础上，第二节分析了数字图书馆主体性质，认为数字图书馆应坚持其公益性，而其他和数字图书馆提供类似服务的非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不应再称为“数字图书馆”，以和前者相区分。最后，对数字图书馆在版权法中的法律主体地位进行了定位，即数字图书馆集信息资源生产者、信息资源使用者和信息资源传播者三重身份于一身，作为不同的权利主体，应适用不同的版权授权方式。

第 4 章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版权纠纷及其根源分析

4.1 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的产生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图书馆建设方兴未艾,国内涌现出了超星等知名的数字图书馆运营商。国家图书馆二期暨国家数字图书馆也于 2008 年 9 月 9 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国家图书馆。2004 年年末,搜索巨人 Google 推出了世界数字图书馆的计划,计划将世界上所有的书数字化,用 5 年的时间把 5 000 万册图书搬上网络。

但在数字图书馆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也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2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案这一国内数字图书馆侵犯版权第一案至今,仅在北京地区有关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诉讼就已过百起。国内较为著名的书生、方正、超星、万方等数字图书馆也都先后遭遇了版权相关的纠纷:2003 年,著名法学专家郑成思以侵犯其著作权为由,状告书生数字图书馆;2004 年年初,社科院法学所知识产权中心郑成思等 7 名专家诉“书生之家”侵犯著

作权；2007年，自由撰稿人李昌奎状告超星数字图书馆侵犯其数部作品的著作权；2007年12月，六位博士诉万方公司侵犯博士学位论文著作权。而在随后的2008年，万方公司在4月和9月又被两批数百名硕士、博士告上法庭。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工程——谷歌数字图书馆，该项目自2004年启动以来，就非议不断，也曾因此于2005年一度搁置。2008年，美国作家协会与美国出版商协会就谷歌未经授权对图书进行数字化一事达成和解协议。根据美国《版权法》，中国著作权人也会包含在和解协议内。如果中国著作权人不同意和解，可以提出诉讼，另行要求赔偿，但不得晚于2010年1月5日。美国法院对谷歌提出的和解协议将召开听证会，此协议一旦获得批准，将产生效力。谷歌这种“先兵后礼”的做法引起了中国很多作家的不满。中国作协和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表广大著作权人展开了针对谷歌的维权行动，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谷歌方面代表已进行了三次会谈，虽未对侵权行为和赔偿问题做出认定，但谷歌已公开表示歉意。当下，谷歌数字图书馆在中国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

在已审结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中，除了原、被告双方自行和解而结案的外，法院无一例外地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①版权问题俨然已成为数字图书馆发展的“瓶颈”。

由于数字图书馆在其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涉及版权纠纷的环节以及版权的形式有所不同，因此要决定采用何种版权授权方式，有必要结合不同环节涉及的权利类型加以考虑。

① 殷凌云，郝曦．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问题探讨——以多起典型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为例[J]．电子知识产权，2007（5）：49-51．

4.2 数字图书馆遭遇版权纠纷的主要环节及版权类型

从国内外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实践,我们可以认识到,数字图书馆在其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对于版权问题一旦处理不善,就会陷入版权的纷争之中。这就要求数字图书馆在进行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整个过程中都要认真对待版权问题,针对可能引起版权纠纷的环节,既要作为信息资源的传播者和使用者做好向其他权利人取得授权的工作,同时也要积极做好自身的版权保护和版权授权许可工作。结合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实际,数字图书馆在馆藏资源数字化、虚拟馆藏建设、数据库开发与利用、信息资源传播等环节都可能遇到版权问题。

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信息资源包括实体馆藏资源和虚拟馆藏资源两部分。实体馆藏资源涵盖了自购数字制品和网上信息资源下载;虚拟馆藏资源则根据特定目标,选定信息资源的学科领域,对相关网站或网页进行搜索、收集和鉴定,并对核实后的网址进行合理组织,形成“信息集合”。^①网络上分散着大量的数字信息,对这些数字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加工后可以有效丰富数字图书馆的虚拟馆藏内容。因此,虚拟馆藏对于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数字图书馆的虚拟馆藏建设是以超链接形式开展的,具体而言,就是利用各种搜索引擎和网络指南开发网络信息资源,以超文本链接和系统缓存方式,组建专业信息资源指引库。对于链接操作过程中的法律问题,《信

^① 江向东. 版权制度下的数字信息公共传播[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链接行为适用了过错推定原则,《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数字图书馆只需要遵照条例的免责规定进行链接行为,就很容易在该环节避开侵权问题。

可见,数字图书馆尚存版权问题的环节有以下三个。

4.2.1 馆藏资源数字化过程和复制权

馆藏资源数字化是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核心环节,数字图书馆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数字化信息资源而展开的,而馆藏文献是其数字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何定性馆藏文献的数字化行为呢?图书馆是否有权对其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操作呢?

对于已进入公有领域的馆藏文献,业内人士看法较为一致,认为著作权人的经济权利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图书馆可以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数字化,但要尊重作者的精神权利,即保障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的完整性权。而对于尚处于版权保护期内的版权作品,国内外的相关法律法规均体现了将其视为复制行为的一种。1995年,美国在其《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中规定了集中构成复制的情况,将数字化规定为复制行为;美国《版权法》规定,复制是以现在所知的或者将来发展出来的方法将作品固定下来保持一种稳定状态的行为,能够直接或者借助设备或者装置间接地为社会公众所使用。《伯尔尼公约》第9条认为,复制可以以任何方式或形式进行。可见,它们都以一种原则性的标准来衡量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复

制行为,复制具体采用什么形式或者方法并不是关键。^①

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世界知识产权版权条约》(WCT)议定声明第1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议定声明第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5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1项关于复制方式的未穷尽表述,都说明数字化为版权人的复制权。我国版权局制定的《关于制作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规定》中第2条则明确指出,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1)所指的复制行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既然数字化是复制权的一种,那它就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而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权利,图书馆可以按照《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权的需要,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但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涉及的馆藏资源数字化显然不是出于该目的,因此被“合理使用”拒之于法律门外。所以,数字图书馆对尚在版权保护期内的馆藏文献的数字化,必须取得作者的授权,参照复制权的相关规定,严格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否则就有受到侵权指控而承担版权责任的风险。

4.2.2 信息资源传播过程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通过网络实现跨地域向公众提供作品和数字化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与数字化制品,这是数字图书馆的最大优势所

^① 黄纪阳.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著作权问题及保护制度研究[J].江西图书馆学刊,2009(2).

在,也是数字图书馆提供服务的主要方式之一。^①但网络传播的便捷性、低成本性和广泛性无疑会影响权利人的利益,使得数字图书馆的这一服务方式与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著作权邻接权人的向公众传播权直接相关,倘若处理不当就会发生侵权行为。我国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明确规定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相关规定,数字图书馆对作品进行网络传播的合法方式仅限于以下几种:(1)经著作权人许可,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进行网络传播;(2)将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包括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进行网络传播;(3)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并且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数字图书馆作为公共传播的重要载体,国家并未予以相应的权利例外。对于馆藏版权数字作品,仅能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的限制,使得数字图书馆的优越性无从发挥。若致力于信息资源共享,将文献进行广泛传播,又会触犯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数字图书馆在提供信息网络传播服务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努力寻求一种授权模式,既能够满足公众需求,又不损害权利人的利益,从而在公众和版权人利益之间做出平衡。

① 王静君.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著作权问题探析[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08 (7): 48-51.

4.2.3 数据库开发利用过程和汇编权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核心是信息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数据库是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组织的主要形式,它是指经系统或有序的安排,并可通过电子或其他手段单独加以访问的独立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集合。^①数字图书馆正是通过对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进行选择、编排,将各种数字信息统一于数字图书馆的网络平台,针对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一站式”信息服务。

数据库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与营运中的重点,数字图书馆中绝大多数的文献资源都是按照一定的序列排列在数据库中,以供用户搜索。^②在数据库开发过程中,制作者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逻辑思维过程和筛选整合过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为保障数据库制作者的利益,鼓励其创作热情,理应对制作者的权利进行法律保护。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以《版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流。世界上大约有 130 多个国家为数据库提供版权保护,我国也是采用《版权法》保护数据库的国家之一。^③《伯尔尼公约》第 2 条第 5 款:“文学或文艺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由于对材料的选择与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的,应得到相应的、但不损害汇编内每一作品的版权保护。”此规定将数据库的保护列入了“汇编作品”之列,但强调对汇编内容进行选择和编排的原创性。^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 10 条第 2 款:“数据或其他资料汇编,不论以机器可读形式或其

① 周洁凤. 数字图书馆与数据库的知识产权保护[J]. 图书馆, 2006 (4): 60-62.

② 刘晓婷. 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研究[D].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2007.

③ 李勇宁. 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问题[J]. 科技信息, 2008 (26): 10-11.

④ 王斌.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他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内容的选择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应受同等保护，此种保护不涉及数据或材料本身，并不得减损对数据或者材料本身业已存在的版权”；《世界知识产权版权条约》（WCT）第5条也做出相关的类似规定。该条规定：“数据或者其他资料的汇编，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只要由于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其本身即受到保护。这种保护不涉及数据本身，亦不得损害汇编中的数据或资料已存在的任何著作权。”可见，TRIPS和WCT的规定，相对于《伯尔尼公约》，对于数据库保护的范围有所扩大，即不是由作品构成的数据或材料汇编构成的数据库也可以获得“汇编权”的保护。目前，我国对数据库的保护也是在《版权法》基础之上，在该程度上对数据库进行保护。汇编的客体涵盖了不具有著作权的数据材料，但也要以内容选择或编排上体现独创性为保护前提。因此，图书馆在数据库建设中，应避免使用他人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性的部分，而要进行独创性编排，开发具有馆藏特色的数据库。^①

数字图书馆开发的数据库主要有3种类型，即书目数据库、文摘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对于书目型数据库，数字图书馆在开发过程中只要注意尊重权利人的人身权利即可合理使用；而对于文摘型数据库，数字图书馆则需要慎重。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我国《著作权法》仅赋予了报刊的法定许可权，而并未涵盖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其他网络运营商以转载和摘编的法定许可特权，那么，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数字图书馆要针对版权作品进行文摘型数据库的开发，则需要取得版权人的授权。至于全文型数据库，在制作过程中除了应当

① 李勇宁. 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问题[J]. 科技信息, 2008 (26): 10-11.

尊重作者的人身权,对于未发表的作品还应授权取得作者的发表权;对于已发表的作品,如果数据库制作者仅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那么只需要获取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通过出版和发行光盘、磁盘等电子型资源提供信息服务,那么还需要获得权利人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如果数据库制作者采用图像格式数字化作品,那么还应取得期刊社版式设计权的使用许可。^①

数字图书馆等数据库制作者在信息资源建设中投入巨大的资金和人力享有数据库的整体版权,其汇编权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而对于自建特色数据库在使用过程中,数字图书馆则成了享有汇编权的数据库的权利人,应探索适合的授权方式,扩大信息资源共享范围,同时积极拿出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版权,防止侵权性商业滥用行为。

4.2.4 社会化媒体利用过程中的信息版权相关问题

作为网络媒体的一个新兴组成部分,社会化媒体中既存在传统的网络信息版权问题,但同时,其特有属性决定着它面临着新的问题。通过梳理,发现数字图书馆在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资源建设及开展服务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4方面的问题。^②

① 陈秀钦,傅文奇.论期刊全文数据库版权授权的获得[J].情报探索,2007(9):65-67.

② 朱娜娜.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版权保护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3(s2):42-45. 陈秀钦,傅文奇.论期刊全文数据库版权授权的获得[J].情报探索,2007(9):65-67.

一是信息版权属性模糊，没有相应的法律内容支撑。社会化媒体存在的基础之一是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但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应用中的各类原创UGC是否受版权法保护目前尚无定论。当前，我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订）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其保护作品的具体范围，其中并未涵盖随着技术发展近年才出现的微博、微信等新兴社会化媒体应用。在现有法律尚未对此有清晰界定的情况下，学者们对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版权问题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只能靠现有法律以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为标准判定是否侵权，但“独创性”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很容易导致对类似法律案件判决结果的不一致，进而有损法律的权威性。从维权的角度来看，版权人能否成功维权则主要取决于当事法官是否认为其作品具有独创性，主观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维权步履维艰。此外，社会化媒体的即时性与版权保护期限长这一对矛盾的存在，也是时下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的动因之一。如何通过《版权法》的调整，化解这对矛盾，进而为大众及时接触和利用文化作品扫清版权障碍，也是《版权法》在修订中的应有之义。

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维权诉讼困难。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的传播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实现了信息资源的跨地域实时共享。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则强化了这一功能，信息可以依赖用户间的信任和喜好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由于诉讼的提出需要一对一，面对海量的侵权人，一一提出诉讼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而且，目前并非所有的社会化媒体用户在注册时都要求实名认证，那么鉴定用户的真实身份便会使维权成本更加高昂。此外，为了保护互联网版权，一般通行“红旗标准”和“避风港原则”：“红旗标准”是侵权事实已经像鲜艳的红旗一样飘扬在平台面前，平台有删除义务；“避风

港原则”是平台被告知有侵权事实，就必须删除^①。网络运营商把它们作为自己的“杀手锏”，往往对侵权行为的发生视而不见，而在权利人提出异议后只要删除版权作品便可成功规避相应的侵权责任。此外，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版权法》会有所不同，跨地域的侵权问题即使侵权性质明朗，也要面对不同《版权法》间的协调问题。社会化媒体更广的传播范围，更多的侵权主体，用户的匿名性，“避风港原则”的漏洞以及跨地域传播面临的《版权法》的不统一，以上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化媒体中的版权诉讼赔偿困难重重。

三是信息传播速度更快，短时就会造成极大的侵权影响。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模式为如图 4-1 所示的星式传播，该模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传播迅速。社会化媒体应用的便捷性及低成本性使信息得以通过链接和社会关系网在多平台有如病毒裂变般迅速扩散，网络上诸多的热点话题均是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作用下催生的。可想而知，若以此速度传播的是盗版作品，无疑将对版权人的利益造成不可逆的巨大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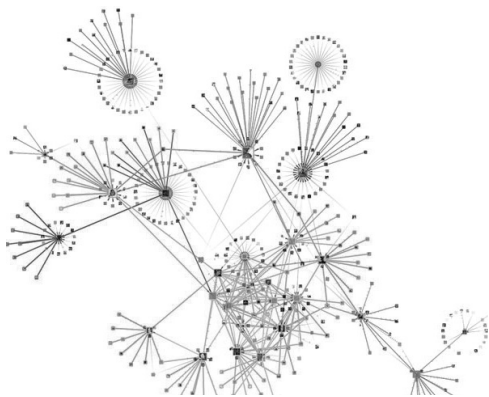


图 4-1 社会化媒体的星状网络传播模式^②

① 张意轩. 微博版权小也也该大作[N]. 人民日报, 2011-8-24 (15).

② 王明会, 丁焰, 白良. 社会化媒体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分析[J]. 业务与运营, 2011 (5): 5-10.

四是针对不同类型 UGC，版权人的维权倾向性有所不同。社会化媒体中的 UGC 有些是用户原创的，但也包括或者基于有价值的第三方版权作品，如电影、音乐和图片等^①。在版权实践中，针对文学、影视等受《版权法》保护的数字化作品，权利人主要关心的是传播权等财产权利的实现；而对于原创 UGC，则更侧重于署名权等精神权利的实现。社会化媒体用户主观一般愿意共享，他们乐于分享，期待关注，他们享受因分享和关注行为给自己带来的社会认可。但问题是，社会化媒体环境下 UGC 具有灵活的可变更性，很多用户分享或转载时不标明出处、不署名、随意改编扭曲作者创作本意，使得作者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无法实现，严重挫伤了作者创作的积极性，方才引起版权纠纷。2013 年 2 月发生了一起某报社记者摘录、改写、曲解以及重新发表新浪微博的个人微博信息一案，从权利人提出赔偿一元并当众道歉的要求中可见一斑：该权利人的做法其实代表了很多社会化媒体用户对待其作品版权的态度，那就是相比以往更加侧重精神权利的实现，如果其作品能够彰显作者进行智力创造的价值，那么很多版权问题将迎刃而解。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版权问题，其出现源于技术的发展，其症结在于版权制度滞后于技术发展所致的制度缺失，以用户为中心的特性则使其解决需要依赖观念的转变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可见，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版权保护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涉及观念、制度、技术、管理等多重因素。基于此，笔者试设计如下“观念—制度—技术—管理”四维信息版权保护机制来解决其中的版权问题。

① Goldstone R, Gill J. Web Site Operators & Liability for UGC - Facing up to Reality?[EB/OL]. [2008-12-31]. <http://www.scl.org/site.aspx?i=ed9981>.

1. 观念维

长期以来,“窃书不为偷”的思想在我国民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广大普通网民版权意识的淡薄曾一度导致网络空间成为“盗版者的天堂”。社会化媒体聚集着庞大的“草根”用户,他们是信息资源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利用者,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版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国家应加大版权保护的宣传力度,积极利用各类媒介鼓励、引导各行各业结合“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12·4 普法日”等开展知识产权法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全民的版权意识,规范网络上传、下载、分享等行为,自觉抵制网络侵权盗版行为。当然,社会化媒体网络运营商作为平台的提供者,也应该牢固树立尊重版权的意识,身体力行地做好版权保护者的角色。

2. 制度维

尽快完善《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等版权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使其适应数字环境下,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各类版权问题解决。

(1) 增加对于社会化媒体中具有一定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原创 UGC 进行版权保护的细则。

(2) 更新“避风港原则”。探索“避风港原则”新规,使其既能为网络运营商提供合理规避,又避免那些明知是版权作品却依然大肆传播的网络运营商在给版权人利益造成损失后以此为由规避版权风险。

(3) 细化网络传播罚则,加大处罚力度。所谓“治乱用重典”,目前网络盗版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其中不乏广大普通网民版权意识淡薄的因素,但以往做法的“法不责众”也是对网络盗版的一种纵容。必须出台针对网络盗版行为的具体罚则,并落实责任到具体机构或个人,严厉打击每一个网络

盗版行为。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对个人传播行为的规范尤为重要。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北京奥运会版权保护的相关做法：为遏制网络空间中的侵权盗版，打击奥运新媒体转播权的非法转播，国家版权局曾在“2008年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中规定，2008年6月12日至10月15日，个人拍的有关奥运赛事的DV、电视截屏画面禁止上网传播，个人上传与此相关的博客也属侵权行为，违者将处10万元以下罚款，触犯刑律的，追究刑事责任^①。

（4）施行弹性制版权保护期。改变一贯对版权保护期一刀切的旧规，对于不同类型作品的版权保护期给予差别化界定，在版权适度保护的基础上便于大众传播和利用作品。

3. 技术维

社会化媒体中的版权问题是技术革新带来的，自然其解决也离不开技术的助力。版权保护现有技术措施包括：（1）IP认证、密码认证和功能限定等预防侵权的技术措施。此类技术措施通过控制用户访问权限，或使用户不能对文档或文件进行打印、复制和保存等操作，来实现限制随意传播作品的目的；（2）数字签名、数字指纹及数字水印等鉴定侵权的技术措施。此类技术措施是提前对作品进行标记，以达到侵权发生后辨识版权归属的目的；（3）影视基因技术。该技术首先是根据版权和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建立影视基因库，然后以“影视基因”技术为核心搭建系统平台，从而对相关网站进行实时监管。该技术有过滤功能，可以进行全网过滤侵权或不健康的影音内容，并快速实现相关内容删除等需求。如今，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探索版权保护的新举措，以迎合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版权保护的新需求。

① 朱鸿军，钟沈军。“零盗版”——北京奥运新媒体版权保护成功的原因剖析和启示[C]。第六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08：210-215。

4. 管理维

社会化媒体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网络应用平台，其管理方式的创新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助力版权保护。

（1）施行实名认证。网络的匿名性，是网络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积极开展实名认证，使社会化媒体成为其用户的实体网络映射，会大大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2013年3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指出要在2014年6月底前出台并实施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这意味着社会化媒体中信息版权保护的“春天”已经到来。

（2）支持UGC授权。社会化媒体网络运营商可以考虑对其UGC设定授权版权和使用的条款，或者让用户选择自由或半自由的许可协议（如Creative Commons）进行授权。目前维基百科中的文字版权利用遵从的就是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3.0协议之条款。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畅通授权渠道，无疑将在建立版权人和公众间的利益平衡、扼制猖獗的侵权盗版和防范版权纠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创新版权运营模式。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徐瑄认为^①，新媒体的特征是多元价值、多信息平台、同时使用、统一发布。因此，新媒体的版权运营模式就是一个有效的管理模式。联合各种媒体、同时首次发表、集权控制收费，就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新媒体是相对于电影、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基于数字技术的所有媒体的集合，包含但不限于社会化媒体。

① 徐瑄. 新媒体时代的版权问题[J]. 新闻战线, 2012 (10): 67-69.

以上4个维度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版权保护方面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其中，观念是根本，制度是保证，技术是关键，管理是过程。分享是社会化媒体运作中的重要机制，用户是分享行为的主体，意识观念决定行为，如果每个用户都有高的版权意识，那么就不会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即从根本上消灭了侵权的源头。制度是版权保护的宏观保障，可以起到正确导向、预防侵权及侵权救济的作用；技术是版权保护的手段和方法，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版权问题因技术进步而生，我们就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技术措施进行版权保护。版权保护体现在管理的过程之中，管理的方式方法会影响版权保护的效果。制度赋予版权人利用技术措施保护版权的权利（技术措施权），为技术等其他维度的版权保护提供法律依托，同时，制度对技术存在制约，以防范技术滥用，平衡版权人和公众利益。信息版权的制度保护和技术保护贯穿在管理的过程之中，管理方式的创新则有助于制度效用的发挥和技术措施的实施。总之，观念、制度、技术、管理的四维版权保护机制是一个有机系统，在版权实践中需要综合协调，相互配合，方能实现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版权保护效能的最大化。

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对信息版权保护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社会化媒体在信息资源共享和促进文化作品传播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若版权障碍能够得以厘清，必然会促进文化作品的空前繁荣。相信在国家宏观政策的积极引导下，在多维度版权保护机制的协调作用下，版权保护和资源共享之间总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实现既保证版权人利益又能满足公众对文化作品需求的双赢目的。

4.3 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的根源分析

数字图书馆现在面临的诉讼不断增多,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权利人版权保护意识的提升;二是律师指引下的“寻租”行为^①,互联网的开放、自由空间和海量作品传播给律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案源,许多以牟利为目的的诉讼由此产生;三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数字图书馆对版权作品进行商业性利用。那么数字图书馆不断面临诉讼的根源何在呢?

根据《版权法》,版权人享有的著作权有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之分。著作权的精神权利,也称为“著作权的人身权”,是指作者通过创作表现其个人品格的作品而享有的一种使其人格、作品受到尊重的权利。精神权利是整个社会给予作者精神上的报答,也是对作者智力劳动的承认。对精神权利的充分保护能够激发版权人的创作热情,并通过署名权这一重要的精神权利,为作者的专有经济圈增添有力保障,实现作者进行创作的社会意义,即通过作品的广泛传播,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发挥其社会价值。自由表达思想见解、展示自我个性、追求社会认可,作为当今社会人们从事创作的重要的价值取向,数字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对该权利的忽视则极大可能会招致权利人的不满,导致版权纠纷。

作者进行智力创作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实现著作权的财产权。所谓著作权的财产权是指著作权人基于对作品的利用给他带来的财产收

① 张平. 现行法律框架下数字版权问题如何解决——以数字图书馆为视角. <http://www.jsbq.org/dynamicinfo.aspx?id=821>, 2009-4-3.

益权。^①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多种权利在内。通过对作品的传播和利用方式的控制，可以给作者和传播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这些利益从源到流，被不同的权利人所分享。财产权作为作者进行再创作的物质保障，对于权利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数字图书馆在对版权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任何现实的或潜在可能影响著作权人财产权实现的行为也会引发相应的版权侵权问题，陷入版权困境。

通过对众多数字版权侵权案件的分析不难发现，著作权人之所以提起上诉，要么是因为运营商未经版权人许可擅自使用权利作品，忽视了对著作权人精神权利的保护，要么是未给予著作权人应得的合理报酬，即版权人的财产权受到了侵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的根源在于使用者未经授权使用了版权人所持有的权利，侵犯了权利人的相关利益。国家数字版权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提到，中国其实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我们1999年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商业（数字）图书馆，还有一些公益的数字图书馆，但是都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是都没有解决好版权授权问题^②。可见，在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利用过程中，如果解决了授权问题，那么所有的版权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4.4 本章小结

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数字图书馆对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传播的方式，网

① 刘春田. 知识产权法（第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② 骆电，胡梦云.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合法性与合理性辨析——由谷歌数字图书馆引发的思考[N]. 人民法院报，2009-12-17.

►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研究

络的低成本复制、超时空等特性有如一把双刃剑，在提高数字图书馆为公众提供共享信息资源服务能力的同时，也对版权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威胁，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由此产生。本章在第一节首先对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第二节对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各环节涉及的版权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在第三节探讨了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产生的根源并提出了解决的关键在于授权。

第 5 章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 版权授权模式的分析与 比较研究

5.1 现有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分析

版权问题是贯穿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是前期资源建设过程中对于他人版权的取得，还是后期资源利用过程中对他人进行的权利授予，数字图书馆员都在积极寻求和努力探索高效的版权授权模式。在面对“海量”的版权信息资源时，数字图书馆必须严格遵循《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现有法律法规，在依法保障权利人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情况下进行信息资源的建设和相应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7 条严格限定了图书馆合理使用的范围，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唯有寻求版权人的授权方可放心使用作品。我国数字图书馆在建设实践中现存以下几种版权授权模式。

5.1.1 单独授权

单独授权亦即传统的“一对一”授权，数字图书馆需要使用某一版权作

品的数字版权时,需要与著作权人单独签署版权许可使用或转让合同,取得授权,达成交易。数字图书馆在使用版权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方式使用,并支付相应的版权报酬。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如果数字图书馆采用这种授权方式取得授权的话,将付出与其自身版权许可费不相适应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在目前版权公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图书馆要独自承担权利调查的任务,当授权数量较大时,权利调查就会面临如下难题:第一,因作品缺乏详细的权利信息或权利信息改变而找不到权利人;第二,数字化作品的假名、匿名现象很多,加之版权管理信息极易被篡改、伪造,权利人身份的真实性难以鉴别^①;第三,数字图书馆面对的是海量作品的授权使用,而作品的数字化使用,使得一部作品的使用就会复合众多权利于一身,这些权利可能又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无疑权利人数量众多,而对任何一个权利人的忽视都会使图书馆招致侵权指控。

超星数字图书馆在实践过程中,将该模式予以个性化拓宽,发展成为自己独特的“超星模式”。超星数字图书馆在其网站上对其版权问题解决提供了两种方案供作者选择:(1)向作者赠送10年期读书卡。作者同意将作品授权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向作者赠送价值3000元的10年期读书卡。10年后作者可以要求继续赠送读书卡;(2)作者要求单独定价,向用户单独收费。读书卡会员也不能免费阅读,必须同意按照作者定价付款后才能阅读。收入的50%支付给作者和出版社。^②超星数字图书馆与作者一对一地谈判并由作者亲自签订授权合同的形式,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风险,同时,由于其对报酬的给予方式已事先拟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以往的传统授权方式

① 张怀涛. 集体授权机制和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J]. 图书与情报, 2002 (3): 5-8.

② <http://www.ssreader.com/shengming/shengming.html>.

节省了版权使用者和权利人之间的协商时间，提高了版权交易的效率。而且，超星还选择作者群密集的大学、科研机构、文学艺术团体等作为突破，更进一步提高了签约的效率，降低了经济和时间成本。超星所秉承的尊重作者权利的原则、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授权方式，在社会各界赢得了广泛好评，也由此获得了一大批版权人的支持。钱学森院士、贾兰坡院士、吴文俊院士、刘东生院士等 200 余位两院院士及社科院数百名专家不但授权，而且题词勉励超星。据统计，截止到 2004 年 11 月 1 日，超星数字图书馆已经拥有了 194 000 位签约授权的作者。^①

在肯定其具有一定进步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超星模式存在的不足之处。首先，超星模式依旧未摆脱一对一授权的传统模式，在呈几何级数爆炸式增长的海量作品面前，一对一方式和海量许可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其次，以赠送读书卡的方式取得作者 10 年排他性授权，就相当于否定了其他传播者在这期间对作品传播的权利，这不仅缩小了权利人获利的空间，而且也不利于作品的传播，有损公众利益；最后，不同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浏览和下载量也因此有所不同，而以统一的标准付酬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平均主义的做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有碍于作者授权的积极性。

5.1.2 集体授权

数字图书馆同所有的权利人一一签订版权许可使用合同，固然是零风险，但这样不仅浪费时间、影响上载作品的时效，也会极大加重数字图书馆的经费开销。单独授权模式的局限性，催生了集体管理，并且这种制度在模拟技

① 胡卫丽. 数字环境下著作权许可模式研究[D].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2006.

术（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时代取得了普遍的成功和广泛的认同。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没有使传统环境中已被普遍接受的集体管理制度消失，反而进一步加强。一方面，网络增强了作品的公共性和外部效应，提高了权利人维护其权利所支付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受众增多，受众范围扩大，权利不断裂变，权利人行使和管理权利愈感力不从心。所以，对数字版权集体管理尤为必要。

有关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份比较有影响力的关于集体管理的研究报告中有如下描述：“在集体管理的框架下，权利人授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其权利，即监督相关作品的使用、与潜在的使用者谈判、在合适的情况下发放许可、收取合适的许可费并向权利人分配。”^①权利人一旦将权利委托给集体管理组织，就可免去自己的权利管理之责，而由集体管理组织对权利代为监管。集体管理组织则依法以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不必每次行动分别接受权利人授权或以权利人名义从事业务；在发现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还可以以组织的名义提起诉讼，既可以有效节约管理费用，又可以实现权利人单凭自身无法实现的利益，从而保证权利人利益的最大化。Jay.M.Fujitani^②对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优势有着系统的描述：（1）集体管理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包括权利人的识别成本、评估交易价值的信息收集成本、大量交易的时间；（2）集体管理组织降低了监督成本；（3）集体管理组织平衡了权利人和被许可人的谈判能

① WIPO,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Study on, and advi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rganizations, WIPO Publication No. 688(E), 1999, p. 6.

② Jay. M. Fujitani, “Controlling the Market Power of Performing Rights Societies: an Administrative Substitute for Antitrust Regulation”, 72 Calif. L. Rev. 103, (January, 1984), pp. 107-112. 转引自杨蓉. 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授权方式研究[D].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08.

力。此外，集体管理相对于单独授权而言，有着权利人无法比拟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集体管理组织可以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投入大量资金开发高质量的版权管理系统。例如，德国 GEMA 开发的 CMVV、美国 ASCAP 开发的 ACE 作品数据库、欧洲六国开发的 VERDI 系统、MCSC 和 CASH 联合开发的 DIVA 数据库系统等。著作权交易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从业者具备法律、经济、公关、外语、技术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和相关经验。从整体分析，绝大多数权利人对此是不胜任的。而集体管理组织是从事著作权交易的专门机构，配有具备相关知识与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可以覆盖因为个人能力所限而考虑不周的问题。^①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目前相对来说较好的授权模式，但是这一管理模式的缺憾在于网络上的复制数量及价格确定、个别作品的著作权处理等问题。目前，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在付酬标准方面表现单一，剥夺了作者对报酬的谈判权，同时也有失公平；再者，由于著作权集体管理采取的是作者自愿转移著作权的方式，仅对会员亦即在著作权管理机构登记的权利人的权利进行监管和授权，而对非会员作品则无权问津。没有足够的会员、涵盖版权范围有限便成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最大问题。近年来，部分国家的政府对集体管理组织进行干预和监督，出现的“扩展性集体管理”“强制性集体管理”等新的授权模式便可看成是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探索。

传统的集体管理组织都是依作品类型和版权类型而建立的专门型集体管理组织，由于该模式无法满足使用者对“海量作品”集中授权的需要，由此在国外衍生出了一种称为“百货商店”的综合授权模式。该授权模式可以提

① 赵宾. 个人授权模式的兴起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变革[J]. 河南社会科学, 2009 (3): 80-82.

供各类作品综合管理业务，并通过建立非集中化机制，使各种集体管理组织有机配合，以方便权利管理。从数字图书馆对作品的利用种类、利用数量，以及技术和服务特点来看，“百货商店”授权模式最为有利，无论是授权的经济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会明显下降，而且法律风险小。^①我国目前已经建立和正在筹建中的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都是以作品类型为基础的，版权集体管理状况还比较独立、分散，但由专门性的集体管理组织向综合性集体管理组织发展，提供“一站式”授权服务，将是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趋势。

鉴于我国目前的集体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集体管理机制尚不健全，不仅集体管理机构数量少，而且管理作品的范围也极其有限的现状，图书馆若通过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海量权利人”授权还存在较大问题。

5.1.3 要约授权

要约授权，亦即“授权要约”，是以要约的形式进行授权。授权要约模式是由书生数字图书公司所提出并大力倡导的一种新的版权授权方式。书生公司希望通过对“授权要约模式”的宣传普及，解决目前数字版权授权许可的困境。在书生公司的积极推动下，2004年9月10日，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包含“授权要约”的图书——《最后一根稻草》在北京首发。该书的扉页中做了明确的数字版权使用声明：任何个人或单位均可在满足以下条件时使用该书，授权范围为数字形式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费用为收入的5%，支付方式为在收入产生6个月内付给中华著作权代理总公司收

① 王杰. 著作权集体管理授权模式与其他授权模式的整合[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4): 160-162.

转,使用方式为保持作品完整性,必须注明作者和来源,保留其他权利。^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授权要约的要义:授权要约是指著作权人在图书出版的同时以要约的方式,声明著作权人的权利和作品使用条件,并通过代理机构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使用者只需要履行授权要约确定的条款就可直接使用著作。^②笔者认为,授权要约是权利管理信息和著作权集体管理相结合的一种版权授权方式。

虽然著作权法并未明文规定权利人可以以发出要约的形式进行授权,但通过这种要约承诺的形式达成的合同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且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而版权要约可以理解为版权人通过某种方式,表达按特定条件和传播者、使用者订立合同的意愿。^③从司法实务中来看,作者以在其出版的纸版图书的首页或者末页刊登“权利人授权声明”的方式,将其作品的版权授权范围、授权费用、支付方式及使用方式等达成合同的主要条款列出,并接受数字技术提供商履行义务后的作品版权化过程,是完全符合合同法有关“要约”的基本精神的。^④另一方面,授权要约也满足有效许可协议的各项要求。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除法律特别规定外,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而授权要约作为一种特殊的著作权授权方式,满足了涵盖著作权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的四个基本要求。^⑤

① IT与版权界共推授权要约模式. [2004-9-14]. <http://publish.it168.com/2004/0914/20040914014701.shtml>.

② 周月. 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完善的途径[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9(4): 58-60.

③ 刘志刚. 博客作品适用版权授权方式的可行性分析[J]. 知识产权, 2006(4): 42-46.

④ 杨蓉. 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授权方式研究[D].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08.

⑤ 胡卫丽. 数字环境下著作权许可模式研究[D].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2006.

授权要约不仅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而且优势也显而易见:首先,授权要约模式避免了版权人与海量使用者一一谈判的麻烦,数字图书馆在使用该书的数字版权时,也不必找版权人单独签署版权合同,而只需要按照要约规定使用和付酬即可,因此极大节约了时间和交易成本;其次,它能保证发出要约者一定是权利人,免除了验证权利人身份的成本以及可能产生的误差;最后,为著作权人继续授权提供了条件。^①可见,授权要约既满足双方通过协议方式自愿形成授权关系的要求,又能免除一对一洽谈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授权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②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授权方式,授权要约也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从要约本身来看,因篇幅所限,要约表述会过于简单,条款规定较为模糊,使得法律要件难以界定;另一方面,作为要约的推行者,作者缺乏足够的法律专业知识来独立设计完成要约,而出版社也可能因该模式对其好处不甚明显而缺乏施行的动力,在作者和出版社对其认识不够深入、尚未认可的情况下,单靠市场经济推广有一定的难度。

“折封合同”“点击合同”是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下特有的要约授权模式。这一类合同最早出现在软件上,以“折封合同”(shrink wrap-license)为代表,即软件销售者在出售软件时,印刷在软件的包装上或保存于软件包装内部的格式合同条款。随着作品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扩大与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包括软件在内的许多作品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了直接在网上进行授权,由此衍生出了“点击合同”(click wrap-license)与“浏览合同”(browse wrap-license)等多种合同类型。它们已经脱离了软件授权使用合同的范畴,成了网络时代利

① 刘晶.对数字图书馆取得著作权人授权途径的分析探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8(9):156.

② 王秀丽,于秀丽.授权要约:数字版权贸易的新模式[J].出版发行研究,2008(9):21-24.

用作品的主要途径。^①“折封合同”和“点击合同”的共同特点是版权人预先制订好格式合同，合同的条款置于有形载体的电子出版物包装的显著位置，或置于进入网络信息资源库之前的网页的显著位置，用户只要打开包装或用鼠标点击“确定”按钮，就意味着接受了合同的条款，该合同条款也就成为双方的契约。^②这两类合同虽然本质上属于标准合同，具有授权范围大、授权效率高、授权文本低、操作简便等优点，但数字图书馆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图书馆员可能会因法律意识淡薄和法律知识的匮乏导致对合同条款理解的不深入和不准确，使数字图书馆面临一定的版权风险，又因为合同条款事先由版权人单方面拟定，解释权自然也归版权人，这样在之后的诉讼纠纷中，数字图书馆会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其次，“折封合同”“点击合同”往往是“单边立法”的“霸王”条款，有可能绕过版权规则，出现比法律规定更加严格的条件，从而对公共利益的实现形成强大制约。^③

5.1.4 版权代理机构授权

版权代理机构授权是基于委托授权的法律关系，权利人将自己全部或部分权利委托给版权代理机构，代理机构则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行使权利，并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代理费用。版权代理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性的公司担任版权代理机构，另一类是出版商作为版权代理机构。与集体管理机构主要管理著作权人难以行使的“小”权利不同，著作权代理完全遵照民法上的

① 熊琦. 网络著作权授权使用之合理性初探[J]. 电子知识产权, 2006 (12): 12-15. 转引自 RobertJ. Morril.

Contract Formation and the Shrink Wrap License, 32 New Eng. L. Rev. 515-516 (1998) .

② 齐蕾. 公共文化机构使用数字信息的若干授权模式分析[J]. 档案, 2008 (4): 15-17.

③ 秦珂. 网络环境中影响馆藏绩效的授权模式评介[J]. 情报资料工作, 2005 (3): 49-52.

代理关系，一般管理著作权人比较“大”的权利。^①

专业性的版权代理机构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并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在从事一系列的法律许可行为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就其本质而言，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并无太大区别。国外的版权代理一般都是依附在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之上的，代为进行某些专门领域的版权授权以及费用收取，如美国的版权清算中心（CCC）就通过某些代理人来管理作品。^②与国外活跃的版权代理机构相比，我国版权代理机构数量少得可怜。英国有 200 多家版权代理公司，美国有 600 多家，而中国经国家版权局批准的版权代理机构仅有 28 家，其中 23 家是图书版权代理机构，相对于全国 570 多家出版社、200 多家电子音像出版社、9000 多家杂志社和其他版权相关产业来看，中国版权贸易代理业的市场主体数量稀少，市场集中度高，^③代理范围狭窄，代理内容单一，主要参与图书版权贸易，对已成为国际版权贸易新增长点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作品的版权开发则缺乏力度和深度；而且多数代理机构仅提供版权法律咨询、代理收转版权使用费和图书代理等基础性服务，能够提供诉讼代理、调解版权纠纷服务的很少。此外，该模式仅仅是一对一授权模式的变种，仍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授权模式，因此当下数字图书馆通过该模式解决数字技术下海量授权问题还存在一定难度。

版权代理机构中比较突出的是出版商代理授权模式，即由出版社作为版权授权代理机构，作者将某一作品交付出版的同时，将该作品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一并委托出版社代为行使的授权模式。出版社和期刊社作为图书和期刊出版的主体，有着丰富的出版资源，可以和众多作者取得联

① 胡卫丽. 数字环境下著作权许可模式研究[D].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2006.

② 张平. 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及授权模式探讨[J]. 法律适用, 2010 (1): 40-42.

③ 姚德权, 赵洁. 中国版权代理业的考量与发展[J]. 编辑之友, 2007 (6): 19-22.

系，并且在版权的取得上也以出版合同为纽带，能够与作者保持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数字图书馆建设者可以采用出版商代理授权的模式，通过与出版商合作达到双赢的目的。

对于一部计划出版的作品而言，其出版前提首先是版权人和出版商之间达成出版合同，如果出版社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作者授权，成为其著作权授权代理机构，那么作品交付出版的同时，即将同一作品的数字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财产权委托出版社代为行使。至于合意达成的方式，既可以是双方单独拟定的一份合同，也可以是作为图书出版合同的附带条款加以约定。综观国内，目前已有机械工业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很多出版社都通过对本社图书出版合同的修改，在与作者签署合同时直接获得了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可见，出版商代理授权模式的做法比较简单，具有可操作性，数字图书馆在使用此类版权时，只需要与出版商进行协商，在图书出版合同签订过程中，便可连带完成版权交易，既免去了验证权利人身份的成本，又省去了授权谈判的时间和费用，从而极大提高了授权的效率，因此，该模式颇受数字出版者欢迎。同时，这种授权是非排他性的，出版社和作者可以继续和其他机构合作。但这种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仅适用于将要出版或发表的版权作品的授权，对于已发表的作品则考虑不到。^①此外，目前很多期刊社以“稿约”的形式来取得作品的数字版权使用权，认为只要作者向期刊社投稿就等于同意了“稿约”中期刊社对来稿享有数字版权的规定。事实上，期刊社这种把原本需要作者以书面“明示”授权的模式单方面变为“默示”授权的做法，并无法律依据，存在着法律风险。^②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明确规定：

① 周恬. 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侵权问题[D].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

② 王斌.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3 条则对该条做了进一步明确：“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的是专有使用权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这里，法律之所以对报社和期刊社有“采取书面形式”的例外规定，是考虑报纸和期刊出版具有周期短、时效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其传播优势的发挥，并且该规定适用的对象也仅限于传统版权，而非数字版权。第 23 条规定的不完善之处，使得许多报社、期刊社对其产生歧义理解，并以此为依据，认为自己不需要与著作权人订立书面合同就可以取得其专有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并非如此。我国《著作权法》第 26 条规定，许可使用合同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可见，著作权人向期刊社投稿，仅是使期刊社获得了专有的发表权，对复制权、汇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使用都非专有。专有使用权的授予需要著作权人以书面合同的方式“明示”，并非“约稿—投稿”行为可以替代。

此外，该模式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版权人愿意将权利委托给出版机构代为行使，但在实践中，相较而言，图书出版机构处于强势地位，版权人则处于弱势地位，在授权条款签订的过程中，出版社能否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谈判，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版权人委托授权的积极性。

5.1.5 共同体授权

数字图书馆在向权利人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取得授权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共同体授权”模式。所谓“共同体授权模式”是指以图书馆联盟的形

式与权利人或集体管理组织谈判取得授权。图书馆联盟 (Library Consortia) 又称图书馆合作体 (Library Coalition)、图书馆同盟 (Library Alliance)、图书馆理事会 (Library Council) 或图书馆链接 (Library Link) 等, 是指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 被参与主体认可的协议和合同的图书馆联合体。^①实践证明, 以共同体授权模式取得授权有这样几方面的益处: 第一, 可以从权利人那里争取到更优惠的价格。集团越大, 价格越优惠, 一般共同体购买比每家图书馆单独购买, 可以得到 30%~50% 的优惠; 第二, 以共同体方式直接与国外出版公司谈判订购国外的期刊和图书, 可以节省代理费用 15%~30%; 第三, 减少每个图书馆分别同权利人谈判的时间成本; 第四, 可以以共同体的名义, 要求权利人改进服务工作。^②共同体授权模式是一种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授权模式, 具有授权成本低、可操作性强、法律风险小等优点, 但其发展前提是增强图书馆的联盟意识, 只有加入了共同体联盟才有行使共同体授权模式的权利。对于风险性大、附加值高的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选用共同体授权模式。^③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图书馆联盟, 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的 OhioLINK、Texshare、宾州学术图书馆联盟 (DALCI)、大学合作委员会 (CIC)、英国图书馆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 (JISC) 等。我国图书馆联盟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建立, 并且发展迅速, 建立了若干新型的图书馆共同体, 但从整体上来看, 目前的图书馆联盟覆盖面还比较低, 除比较知名的 CALIS 等少数几个共同体外, 大多数共同体尚处于起步阶段。

① 王杰. 网络版权环境下公益性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08 (2): 93-95. 转引自王东波. 数字图书馆联盟及中国特色数字图书馆联盟建设策略. 新世纪图书馆, 2004 (1): 35-38.

② 秦珂. 网络环境中影响馆藏绩效的授权模式评介[J]. 情报资料工作, 2005 (3): 49-52.

③ 庄善杰. 基于权利弱化理论的图书馆版权利益平衡制度的实现[J]. 情报探索, 2008 (12): 86-88.

5.1.6 DR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数字权限管理)

网络环境下, 数字化作品的传播方式具有无磨损性、低成本性和广泛性等特点, 任何作品一旦上网, 它将摆脱原有载体的束缚, 不受权利人控制, 网络上的自由 (free) 成为免费 (free) 的同义词, 个人复制和商业复制的界限也变得日渐模糊, 现有《版权法》规定的个人合理使用会极大萎缩传统的著作权市场, 虽然《著作权法》赋予版权人的各项权利依然存在, 但由于个人使用的广泛性和隐匿性, 权利人显然无法向每一个侵权人索求赔偿, 维权成本的高昂让这些权利成了一纸空文。作为回应, 国内外法律都允许权利人通过技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 专设了“版权保护系统和版权管理信息”一章, 对技术保护措施进行了集中详尽的规定;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4 条也规定“为了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网络传播的特点使得各种授权模式使用都必须辅以一定的技术保护措施, 而在众多的技术措施中, 数字权限管理是运用最为广泛和成熟的一种。

数字权限管理 (DRM) 是指对数字化信息产品 (图书、音乐、图像、录像、多媒体文件等) 在网络中交易、传输和利用时所涉及的各方权利进行定义、描述、保护和监控的整体机制, 是数字化信息环境可靠运行和不断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①DRM 又分为两大类技术: 一类是基于认证的 DRM 技术, 该方法通过加密技术和硬件绑定技术的结合可以达到防止非法复制、阻止盗版发生的目的; 另一类是数字水印技术, 通过检测水印可以达到版权鉴别的

① 胡科学. 浅析数字权限管理在图书馆中的应用[J]. 中国科技信息, 2009 (9) .

目的,在盗版发生后提供版权鉴定,为解决版权纠纷提供证据。DRM 虽然可以通过采用下载计费、数字底纹加密、硬盘绑定等措施,实现对数字化出版物传播范围的控制,通过限定电子图书的阅读期限、阅读次数以及下载、复制、打印等行为,起到有效保护版权的作用,但同时也限制了用户的正常信息获取。具体而言,DRM 在数字图书馆的应用中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DRM 技术对用户作品的接触和浏览进行限制,削弱了读者对信息的判断与选择能力;第二,DRM 限制了图书馆及其用户对作品的传统使用;第三,DRM 系统使用户对作品的个人使用效率低下;第四,用户的隐私容易泄露。^①此外,DRM 是一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复杂技术,需要相当的资金和人力来完成,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公益性机构,其收入产出比如何确定方显合理值得商榷。而且,技术总是在发展的,一旦所应用的技术被破解,又将使自己陷入版权纷争。同时,数字图书馆在选择 DRM 技术方案时,应考虑适度问题,防止不恰当运用 DRM 而造成服务功能的欠缺或因保护力度过强而丧失部分读者群,影响其公益性的发挥。数字图书馆在进行 DRM 开发时,应综合考虑各类资源版权保护需要的程度,采用既满足功能要求又经济上合理的 DRM 解决方案。^②

5.1.7 Google 模式

2004 年 12 月 14 日,世界著名搜索引擎公司 Google 宣布实施 Google Library (谷歌图书馆)项目,计划将若干所著名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扫描制成电子版后放到网上供读者搜索阅读。^③但由于该计划威胁了出版

① 胡科学. 浅析数字权限管理在图书馆中的应用[J]. 中国科技信息, 2009 (9) .

② 郭德华. 数字图书馆实施 DRM 的对策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05 (5) .

③ 刘燕. Google Library 版权政策对图书馆授权模式探索与创新的启示[J]. 情报资料工作, 2008 (6): 66-68, 75.

商的利益，所以一出台便遭到来自美国出版界的反对。为了缓解和出版界之间的矛盾，2005年8月11日，Google宣布了它的“舍弃”(Opt-out)策略(默认许可制度)。根据该策略，如果一个出版者向Google提供一份不想Google扫描的书籍清单，那么Google就会放弃对这些书籍的扫描。^①Google这种将防止侵权的责任转嫁给版权人而非使用者的策略并未赢得美国出版界的满意。相反，2005年9月20日，美国出版者协会和美国作者指导协会等发起集团诉讼，将Google告上联邦区域法院。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程序，2008年10月，Google出资1.25亿美元与出版者、作者达成了和解协议。根据该协议，Google将继续提供图书搜索服务，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该服务采用商业化模式运作，并与出版社和作者实现利益分享。协议还创建了一专门机构Book Rights Registry (BRR，图书版权登记处)来分配收益，其中Google持有37%，其余63%支付给BRR。此外，Google还将提前支付给BRR 45 000 000美元用以分配给2009年1月5日前被扫描图书的版权人(该协议不适用于2009年1月5日之后首次出版的图书)^②。

Google和解协议中将书籍分为三类：一是版权图书商业性使用；二是版权图书非商业性使用；三是公共领域图书。根据协议，Google有判断作品是否属于商业性使用的决定权，同时，还将决定一部作品是否处于公有领域。和解协议为Google错误的初始分类提供了一个“安全港”。由于协议赋予了版权人退出协议、从Google服务器移除特定书籍以及针对特定书籍改变任意默认规则的能力，那么权利人就很有可能严格地管理其版权而非服从协议的

① 吕炳斌. 网络时代的版权默许许可制度——两起Google案的分析[J]. 电子知识产权, 2009 (7): 73-76.

② Jonathan Band.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Libraries And The Google Library Project Settlement[J].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November 13, 2008.

一般默认规定，这就使得协议很有可能对于受版权保护的、商业性使用的书籍有极其有限的适用性。这就意味着和解协议主要聚焦于不再进行商业性使用的版权图书。Google 预计其出版图书中有 70%都将归于此类，20%处于公有领域，10%是版权图书商业性使用。^①

Google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策略经历了由默示许可到明示许可的变化：向图书馆取得授权继而对馆藏作品进行数字化使用——“舍弃”策略——前期支付+后期利益共享。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图书馆并非其馆藏特定作品的权利人，所以第一种图书馆授权方式显然存在争议不可取；2005 年 Google 所遭遇的集团诉讼也用现实说明了类似于“默示许可”的“舍弃”策略也是行不通的。鉴于目前 Google 所采用的第三种版权策略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与版权人、出版社之间的利益，故较具有代表性。这里，笔者将和解协议达成后 Google 所采用的版权授权模式称为“Google 模式”。

Google 模式中预先支付的资金可以看成对版权人复制权的购买，而后期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使用则是通过和版权人、出版社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该模式既使得公众通过 Google Library 的平台检索到自己所需图书的题目信息以及收藏或购买线索，又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度，版权人和出版商也可以通过该平台获得实际收益，较好地平衡了公众和版权人各方的利益，是一种多赢的策略。鉴于此，有学者建议^②：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也应仿效 Google 的图书分类，对于在版图书、绝版图书和公有领域图书提供差异化的数字信息服务，同时采用多元化的版权利用模式。

① Jonathan Band.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Libraries And The Google Library Project Settlement[J].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November 13, 2008.

② 刘燕. Google Library 版权政策的思考[J]. 情报科学, 2009 (1): 57-59.

5.2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的新探索

全媒体时代我国数字图书馆在建设过程中也在不断探索新的模式，具体包括以下。

5.2.1 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是指依据法律规定，事先不需要经版权人许可，可以直接以特定方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但必须向版权人支付报酬。我国《著作权法》第 23 条、第 32 条、第 39 条、第 42 条、第 43 条规定了 5 种法定许可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 条则是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版权使用的法定许可。以上涉及的法定许可内容，都包含了作者事先声明的例外条款。相比于国外立法，法定许可的适用不论版权人是否有事先声明都可直接采用的立法模式，我国现行《版权法》中的法定许可形式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法定许可，有学者称之为“准法定许可”。准法定许可形式的弊端在于可能因“例外”而导致该法定许可规定落空，或是“声明”为某些身为权利受让人的利益集团（如受让音乐作品录音权的唱片公司）所利用，成为他们独占作品的工具。鉴于此，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8 条基于“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国家教育规划”的需要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中，不再有“声明”的例外条款，而是扩大为完全意义上的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有如下特点：一是使用者有其特定的范围限定，我国《著作权

法》采用列举的方式分别授予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教科书的责任者以及录音制品的制作者法定许可使用权；二是从使用者角度，不需要事先申请或通知，符合条件者即可以使用；三是从许可程序上，法律直接授予使用权，而不需要权利人许可或是经主管机关批准；四是从使用形式上看，法定许可形式主要涉及汇编、转载、录制和广播等。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数字图书馆并未在法定许可的使用者范围之列，但其现行资源建设和服务的方式确实涉及了汇编（虚拟馆藏建设中）、转载（特色数据库建设中）等行为，数字图书馆和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相比有着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信息传播价值，公益性数字图书馆更是担负着传播文化知识、提升国民素质的神圣使命，因此理应将数字图书馆尤其是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纳入法定许可范畴，只是对于支付标准及报酬来源方面进行区别对待。

5.2.2 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由版权主管机关根据申请和实际情况，授予申请人对他人已发表作品进行特定方式使用的权利，并支付相应报酬的一种制度安排。强制许可的使用形式一般表现为翻译、广播和复制。我国没有版权强制许可使用的相关内容，但是《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使用他国作品颁发强制许可证的优惠条款，即为了学习、教学、研究活动和公众需要的目的，需要使用外国作品（仅限于印刷出版物及仅为系统教学用的视听作品）的使用人（许可主体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无从得到外国著作权人许可时，通过一定程序，从本国著作权管理机关获得强制许可证，以特定方式（限为翻译、广播、复制）使用有关作品，并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我国是上述两个条约的会员国，因此适用该规定。网

络环境下,我国数字图书馆应根据公约的相关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就翻译和复制两公约其他成员国的作品申请强制许可,从而充分开发利用外文文献,以满足公众需求。但是由于两公约都对强制许可证的颁发附加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和复杂的申请程序,导致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对我国大多数图书情报部门开发国外版权作品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强制许可制度设立的直接目的在于防止知识产权人滥用其独占实施权和许可权,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同时,引入强制许可制度还可以增加交易成功的概率。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强制许可实际上是国家安排下的“合作博弈”。霍布斯认为,即使在谈判中没有严重障碍,人们也极少有理性能在剩余的分割上达成协议,除非有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迫使他们同意。^①我国现行《版权法》的法律法规,使得网络环境下权利人的专有权进一步扩张,不仅规定版权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且规定了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如果不对权利人的专有权加以限制,必然会妨碍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接触及利用,从而阻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数字图书馆具有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信息传播价值,政府应对数字图书馆适用强制许可,当数字图书馆无法取得权利人授权又有合法理由时,版权主管机关应授予数字图书馆以许可使用权,并尽量使双方在使用费用上达成一致,如果双方无法取得一致,则由主管机关决定数字图书馆应当支付的使用费,如此将大大提高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效率。但在国内引入强制许可制度的过程中,应注意防止国家公权力的过度干预,只有在找不到权利人或协商不成功时方适用强制许可,另外还应简化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使用者的申请程序,严格限制颁发强制许可证的客体 and 类型,并对强制许可证做一些必要的限制,同时还要将非公益

① 王斌.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强制许可制度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08(12).

性机构和数字图书馆等公益性机构的收费标准区别对待。

5.2.3 默示许可

默示许可，又称推定许可，是指即便版权人未明示许可使用其作品，但从版权人的行为或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推定版权人对他人使用其作品不表示反对，从而认定经由许可而利用作品的样态。默示最初属于民事行为范畴，是对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的一种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

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具有高速型和快捷性的特点，如果凡是作品使用均需要取得授权，那么势必影响信息传播的效率。针对特定对象的特定需求，对特定类型和范围的作品实施默示许可有必要成为网络时代著作权授权许可的有力补充。美国学者约内森·罗森诺指出，设立和运营面向公众的万维网网站的行为本身应意味着允许他人进入和使用的默示许可。^①因此，作者将自己的论文、PPT、报告等作品以诸如博客、BBS 之类的形式传播到公共平台的行为本身，应当推定其对网上的某些使用行为是默许的。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对于网络经营者而言，可以通过声明、告示等内容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格式合同，要求对张贴在其服务器上的作品，适用默示许可。^②数字图书馆出于公益目的，对此类信息进行收集和分类整理后用于扩充其虚拟馆藏，

① [美]约内森·罗森诺.《网络法：关于因特网的法律》.张奉形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② 张平. 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及授权模式探讨[J]. 法律适用，2010（1）：40-42.

向公众提供的行为也理应以默示许可的形式被法律所认可。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于 2006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其中第 9 条规定的基于扶助贫困的许可可以看作我国在立法层面对默示许可利用作品情形的首次确认。在默示许可制度下,著作权人可以行使的是许可权、报酬请求权和禁止权。^①这就要求权利人必须对自己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及其后果有着充分的认知,不得在利用行为发生后启动损害赔偿请求权或禁止权,而只能先选择行使报酬请求权。如此,既可以有效保障版权人的应得利益,又可以规范现有使用者采用版权声明用以规避风险的行为,为使用者提供法律框架下的行为尺度。

5.2.4 版权补偿金

网络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信息生产、传播、存储和利用的旧有模式,大规模、低成本的私人复制行为使得版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侵害,但版权人对此却无力招架。由此,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将目光投向于版权补偿金制度。1965 年,版权补偿金制度率先在德国施行。最初只是针对录音设备制造商收取一定费用,后伴随科技发展,征税的范围扩大到录制设备、空白媒介和复印设备三类。而后在 2007 年 9 月 21 日德国参议院通过的《规范信息社会著作权的第二部法律》(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中进一步规定,所有通常被用来制作合法复制件的机器和储存介质均负有缴费义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及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将版权补偿金制度引入了本国法律,非洲的刚果也在设置版权补偿金制度的国家之列。

① 梅术文. 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不足与完善[J]. 法学, 2009 (6): 50-58.

在我国,版权补偿金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它是一种针对非商业目的的私人复制行为,通过向复制设备和存储介质生产者统一收取一定费用来补偿版权人的智力创作,把《版权法》赋予权利人对权利(尤其是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一些难以实现的权利)的专有使用的绝对权利转化为报酬请求权的制度安排。该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版权人和代表公众利益的数字图书馆间的版权冲突:从版权人角度看,获得了合理的收益作为其智力创作的补偿;而从数字图书馆角度看,也以合理的途径获得了版权,从而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作为一种法定授权,补偿金制度一方面免去了授权程序,消除了图书馆自行开展权利调查和授权谈判过程中的种种经济支出,同时减少了权利人监督管理其版权作品的费用,使得版权交易成本明显下降,提高了版权使用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补偿金制度是按法定标准付酬的,从而杜绝了权利人向图书馆任何高额对价的要求,避免了权利滥用和过度的权利垄断,在使私人利益得到保障的同时维护了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版权资源的社会效用。^①但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补偿金是对超出合理限度给予版权的适当补偿,而并非复制权使用费,因此不可能达到“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实质公平。同时,由于补偿金的收取和发放离不开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中介作用,因此该制度实施的一个关键是要有完善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机制相支持。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虽已公布实施,并且相继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文字著作权协会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但总体来说,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还无法对补偿金数额进行合理确定和分配,同时,补偿金的调整范围、来源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因此,在数字图书馆推行版权制度可能为时尚早,但却不失为

① 秦珂. 版权补偿金制度和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5 (2) : 155-158.

面向未来的一个好的授权选择。

5.2.5 开放存取

开放存取（Open Access, OA）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是面对国际出版界、学术界和图书情报界等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网络自由传播而发起的运动。《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对开放存取的定义：某文献在互联网公共领域里可以被免费获取，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复制、传递、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他任何合法用途。用户在使用该文献时不受财力、法律或技术的限制，而只需要在存取时保持文献的完整性，对其复制和传递的唯一限制，或者说版权的唯一作用，应是使作者有权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及作品被准确接收和引用。^①简而言之，“开放存取”就是让读者通过互联网可免费浏览和获取各类文献，实现文献信息的自由传播，而唯一的版权限制就是保持作品的完整性。BOAI 同时还提出了实现 OA 的两种方式：自我存档（Self Archiving）和开放获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②自我存档是通过相关的开放获取工具软件，收集机构、组织或个人拥有的文献信息并以数字形式存放于数据库，作为开放式的电子档案储存以供使用，从而形成了三种自我存档形式：机构创建的机构资源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按学科创建的学科资源库（Discipline Repository, DR）以及以网页形式发表的个

① open access, 开放获取（开放存取）定义[ES/OL][2008-08-08] <http://www.oalib.com/html/xwdt10Ajieshao/5776.html> [2009-02-01].

② Gerry McKiernan. Perspectives in electronic publishing:an open access-dynamic-virtual electronic journal[J], Library Hi Tech News, 2001（8）: 19-27.

人研究成果、讲义或 PPT 等。^①开放存取期刊是一种基于 OA 模式出版的网络化的免费期刊，它既可能是新创办的电子版期刊，也可能是由已有的传统期刊转变而来。其经费来源主要是由主办者筹措资金，不收取或少收取作者的存储与发布费用，而对所有读者则不收取任何使用费用。

OA 模式是一种成本较低、效益较好的信息交流方式，它改变了传统学术信息的交流方式：首先，对所有用户完全免费开放是 OA 的最大特点，这保证更多用户跨过版权和技术的障碍获取所需信息从而使 OA 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其次，OA 克服了传统出版的时滞，使得科研成果可迅速与人共享，既消除了因各期刊出版时滞不同引发的首发权的争议，又可以显著提高论文的被引频次。例如，对 119 924 篇公开发表的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会议论文调查发现，OA 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 7.03，非 OA 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仅为 2.74；^②而在电子工程、数学等学科中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发表于同一种期刊中 OA 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也都不能高于非 OA 论文的。最后，OA 具有较强的交互性和互操作性，通过 OA 提供的交互平台，作者和读者间以及不同作者间都可以进行及时交流，来自读者的反馈以及交流的心得既可以帮助校正研究中的不足，又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信息。此外，通过 OA 模式出版的论文其版权由作者保留，这有别于传统出版中由出版社保留版权，在出版商靠其强势地位打压版权人的今天，该特征使得 OA 模式对权利人尤其具有吸引力。总之，OA 可以打破目前由于科研信息的封闭交流和有偿使用所造成的信息获取的不平等，促进科研人员之间及其与公众之间的学术信息

① 李明理. 开放获取及其对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的影响[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57-359.

② 刘海霞，方平，胡德华. 开放存取研究进展述评. 图书与情报，2006（4）：10-16.

交流,提高科研经费和科研成果的利用率。^①

传统期刊目前有数量增加、订阅费大幅提升的趋势,即便是顶级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强大的资金实力支持其订阅全部期刊,那么作为没有营业收入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对此更是力不从心。同时,各国《版权法》都在不断强化权利人权利保护,数字图书馆已然被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为了在网络时代继续以至更好地发挥其信息传播价值,数字图书馆有必要参与和实践 OA:一方面,通过 OA 的开放式授权免费利用其文献,加强自身的虚拟馆藏建设;另一方面,对于自身开发的特色数据库成果也可以尝试采用 OA 模式对外授权,扩大成果的传播范围,提高成果利用度,这无论是对于提升数字图书馆自身的影响力还是加强全社会的信息共享都不无裨益。

5.2.6 创作共用 (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 Commons (简称 CC),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莱斯格 (Lawrence Lessig) 等人于 2001 年创建的非营利组织——知识共享组织 (Creative Commons Corporation) 发起并创立,是网络上的数字作品 (文学、美术、音乐等) 许可授权机制。CC 在我国通常被译为创作共用或知识共享,其实质是一种授权协议,该机制提供了 4 种可供选择的基本授权:署名 (可以自由使用,但须保留原创者的署名)、非商业用途 (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不能用于商业用途)、非派生作品 (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不能改编和派生)、保持一致 (自由使用,也可以改编,但是要遵循和原作品同样的协议)。任何作

① 宗诚,马海群.数字图书馆视角的开放存取机制及著作权授权制度的优化[J].图书情报知识,2009 (3): 105-108.

者都可以通过对这4种授权方式选择不同组合来完成对自己作品的授权,1.0版的CC许可证形成了由松到紧的11种灵活组合方式。^①因为大部分人选择署名,因此,在2004年5月25日发布的CC许可证的2.0版本中,可供选择许可证的数目从11个降到6个,即署名;署名—非派生作品;署名—非派生作品—非商业用途;署名—非商业用途;署名—非商业用途—保持一致;署名—保持一致。^②选择了署名,并不代表作者必须署名,作者有保留或放弃的权利自由。2006年3月,CC中国大陆项目组完成了CC协议的本地化工作,正式发布了简体中文版创作共用(CC China)。^③

面对版权制度与日俱增而对创作产生限制的预设规定,创作共用构建了一层合理的、有弹性的版权机制,将传统对作品的“保留所有权利”(All Rights Reserved)的授权模式改为“保留部分权利”(Some Rights Reserved)或“不保留权利”(No Rights Reserved)。CC是对互联网上现有的各种私人的、个别的、不规范的版权声明的正规化和标准化,它使得一些有此意愿的创作者跨过限制性的不合理的版权规定,获得了一个合法、便利的授权途径。CC提供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既保护了创作者的作品,保障了创作者的版权,又使得他人可以以特定方式来使用这些作品,让更多创造性作品都有机会被自由地、广泛地分享和再创造,从而促进人类知识作品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最大价值。

在操作上,CC作品及其版权授权状态相联结,并能够以机器可识别的方式,通过CC的搜索应用程序或其他线上的应用程序被找到,从而借由机器

① 洪伟达,马海群. 面向信息权利的著作权制度效率改进——以创作共用为视角[J]. 图书馆论坛, 2008(6): 232-236, 256.

② 吴晓萍,周显志. 创作共用:一种新的鼓励自由创作的版权许可制度[J]. 知识产权, 2006(3): 69-72.

③ 杨雁. 版权问题新思路:知识共享协议[J]. 新世纪图书馆, 2008(6): 44-46, 12.

可辨读之授权带来的使用便利更进一步降低授权活动的障碍。数字图书馆和 CC 的契合点在于：CC 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知识自由传播和知识共享，而网上信息资源共享对于数字图书馆发挥自身价值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鉴于 CC 模式对作品版权的授权效率较高、授权范围较广等优点，数字图书馆应积极应用技术搜索 CC 作品，并通过 CC 模式取得相应授权，引进和开发 CC 作品，扩充虚拟馆藏和开发数据库；并继续通过 CC 协议对外授权，鼓励他人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推动人类社会文化的不断创新。但目前 CC 模式存在普及力度不够、认可度不高和协议不规范等问题。

5.3 本章小结

数字环境下，催生了诸多的版权授权模式。数字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实践着单独授权、集体授权、要约授权、出版商代理授权等多种授权模式，同时在理论上探索法定许可、强制许可、默示许可等非自愿许可授权模式及开放存取、创作共用等新型授权模式的可行性。本章系统分析了各种授权模式的优势和不足，为下一章数字图书馆进行版权授权模式整合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6章

全媒体时代面向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版权授权模式的整合

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的现实选择，数字图书馆对于保存日益丰富的数字资源，传承数字文明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数字版权纠纷却正在禁锢着其发展的脚步，传统的一对一授权模式使得数字图书馆将付出与其自身版权许可费不相适应的交易成本。而现有的和正在探索中的版权模式虽然种类繁多，但都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结合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践对各种授权模式加以整合，从而有效解决数字图书馆“海量授权”的难题。

6.1 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6.1.1 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必要性分析

目前，还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适用于档案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使用数字版权的授权模式，现行模式的缺点或者是适用范围狭窄，或者是法

律风险大,或者是授权成本高,或者是授权效率低。^①因此,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有必要根据特定的任务,通过整合各种授权模式,做到优势互补。具体而言,数字图书馆对版权授权模式进行整合的必要性体现如下。

1. 促进数字图书馆传播价值发挥和消除数字鸿沟的必要

正如笔者在第2章所言,数字图书馆,尤其是公益性数字图书馆担负着独特的信息网络传播价值,尤其在保障信息公平、消除数字鸿沟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现有法律规定并未给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一定的权利例外,而公益性数字图书馆面对纷繁复杂的诸多授权模式也往往显得无所适从。因此,有必要对现有和正在探索中的授权模式进行一定整合,使得数字图书馆在版权实践中有章可循,从而充分发挥其网络传播价值,担负起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的应有之责。

2. 数字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

目前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许多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中,对于版权问题的对策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由于我国法律对默示许可等模式并不认可,所以数字图书馆以该形式向权利人获权以求免责的想法是徒劳的。一旦版权人提起诉讼,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效益将大打折扣。而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若对版权问题过于慎重,又容易因内容陈旧等因素导致其落伍,最终面临淘汰的危险。所以,数字图书馆必须通过高效便捷的授权模式综合处理各类版权,使自身得以更好地发展。但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涉及多个环节,不同环节适用不同的授权方式,采用单一的授权模式已无法满足数

① 齐蕾. 公共文化机构使用数字信息的若干授权模式分析[J]. 档案, 2008 (4): 15-17.

字图书馆授权需要，这就要求数字图书馆对各类授权模式进行整合，使其相互配合作用于数字图书馆的版权实践。

3. 来自公众的需求

《信息网络传播权》第7条严格规定了图书馆通过信息网络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内容和范围，内容上仅限于馆藏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范围上则限定于馆舍内。以上规定使得数字图书馆相较于传统图书馆而言几乎无法显示其任何优势。作为数字图书馆的使用者，公众则无法享受网络的便捷性。通过对各种授权模式的整合，数字图书馆可以将经授权的图书等文献上传网上，方便公众随时随地查找所需文献。

4. 来自版权人的需要

从著作权人的角度来看，作品自创作完成，作者就考虑如何才能使版权利益最大化，如何能低成本、大范围地传播其作品，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保障其财产权利的实现也是版权人所关心的问题。所谓“无传播即无权利”，相信每个版权人在创作作品的时候都是希望其作品能被大众认可的。所以，权利人也希望能和数字图书馆之间厘清授权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字图书馆传播作品，并实现其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这也需要数字图书馆对各种授权模式的整合。

6.1.2 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可行性分析

通过上一章对各种授权模式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各种授权模式之

间有差异也有共性，并且它们的优势有互补之处，因此，将各类授权模式进行整合是完全可行的。

首先，除数字版权管理属于技术措施外，其他模式在管理目标、管理方式和组织性质方面存在共性。^①管理目标上，除 DRM 外，现有和探索中的各类版权授权模式都以广泛的资源共享为其管理目标，无论是书生公司推出的授权要约模式，还是时下较流行的 OA 和 CC 模式，都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接触作品，让信息资源得到广泛的共享，促进科学信息的广泛交流，提高科学研究的劳动生产率；管理方式上，除 DRM 之外的各类模式均采用契约式的管理方式，作者和使用者之间都以契约合同的形式进行版权的授权和使用，这点以集体管理、授权要约和创作共用最为突出；部分版权授权模式需要组织机构参与完成授权（版权集体管理、开放存取和代理授权等），这些组织机构在性质上都无一例外属于非营利性机构，这体现了各类授权模式在组织性质上的一致性。

其次，各种授权模式各有利弊，通过整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涉及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传播和提供信息服务等多个环节。通过前面章节的分析，我们知道馆藏资源数字化涉及版权人的复制权，信息资源传播过程涉及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默示许可是有法律风险的，但同时它有授权范围大、授权速度快的优点，而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单纯的数字化行为不会对版权人的利益造成侵害，因此法律上应考虑规定“公益性数字图书馆适用默示许可”的例外，这既消除了默示许可的法律风险，同时，也将加快授权的效率，降低授权成本。版权补

① 马海群，周丽霞. 数字图书馆视角的著作权授权模式整合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09（21）.

偿金适用于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通过“补偿金”,版权人的财产利益得以实现,而公众也可以获得所需信息,数字图书馆也排除了侵权的风险。

综上所述,各类授权模式既有整合的必要性,同时,各类授权模式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有所不同,但还是存在着共性和优势互补之处,所以对其进行整合是可行的。通过整合,可以构造更加高效便捷、科学合理的版权授权模式,提高版权授权效率,降低版权授权成本,实现最佳管理效果。

6.2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基本原则

在肯定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具有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数字图书馆对各种授权模式进行整合的过程中还应遵循以下4个基本原则。

6.2.1 私权保护原则^①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序言部分明确规定:“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版权作为权利人的一种重要私权,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尽管西方各国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保护领域中,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法律传统,在指导立法的哲学思想及所表现出来的立法技术上也都大相径庭,但都有效地保护了作品创作者的个人权利,保持和激励了作者创作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繁荣。可见,专有权是版权的核心,专有

① 周月. 论完善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的基本原则. 情报探索, 2009 (2): 43-45.

权的存在是实现作者的精神和经济权利及利益的最有效保证。作为数字图书馆建设者应当充分重视著作权是私权这一根本性质，并以维护著作权的私权为己任，在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过程中始终贯彻、坚持作者的私权保护原则。

6.2.2 利益平衡原则

作者的私权固然应受到保护，但对版权保护的力度应保持适度。版权的过度保护会导致知识的垄断，使得读者无法获得所需的知识，无法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创作出来的智力成果将成为一种摆设，起不到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版权的过度保护有悖于社会公正原则，不利于知识的扩散和传播，这也势必导致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进程的步履维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版权权利的扩张，但在权利扩张的同时，我们要对它进行必要的限制，达到整体上权利与限制二者间的平衡。

公众利益的维护是对私权保护一种不可或缺的制约。这里的公众利益主要是指版权使用者的利益，为公众提供自由选择使用文化作品的机会。数字图书馆肩负着传播知识信息、提高整体国民素质、推动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使命，在网络环境下应明确其自身作为信息传播者的法律地位，依法兼顾社会公众利益。作为版权人和公众利益间实现版权平衡的机构，一方面，应积极参与《版权法》的修订工作，表明立场，在保护版权人正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建议或者参与立法程序，弱化权利人的相关“专有权”，争取更多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豁免权；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数字信息复制的便捷性、低成本性和广泛性等特点使得版权人对

数字图书馆进行授权持怀疑态度,数字图书馆在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用数字权限管理、数字水印等技术保障权利人的利益不受实质性的损害,从而在创作者和使用者间进行平衡。

6.2.3 “风险-效率”原则

面对多元化的版权授权模式,图书馆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实践。不同的图书馆采用相同的模式可能会取得不同的效果,采用不同的模式也可能取得相同的成效。数字图书馆必须把“最小的法律风险、最低的版权使用费、最简便的方法、最大的收益”的授权原则同每次授权的任务、授权的成本、服务的对象、本馆的资金状况以及拟获得授权的版权作品的版权评价相结合。^①在整合版权授权模式的过程中,坚持“风险-效率”原则,以保证数字图书馆的版权授权活动在法律框架下高效进行,更好地推动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工程建设。

6.2.4 系统协调原则

数字图书馆对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诸多环节均建立在数字图书馆这个网络平台之上,因此,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整体,各环节使用的版权授权方式应该作为其开发与运营的一个必要部分,既要保持在一个环节当中的小系统内优势互补、协调运行,在数字图书馆的整个运营体系中也应注意对授权方式进行沟通协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导致授权效率低下的弊端出现。例如,如果通过一对一的谈判,数字图书馆与版权人签订了特定的版权合同,

① 秦珂. 网络环境中影响馆藏绩效的授权模式评介[J]. 情报资料工作, 2005 (3): 49-52.

那么数字图书馆就可能按照合同约定一次性获得了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如此,只要按照约定的方式使用即可。如果数字图书馆对该版权作品继续使用采用了诸如版权补偿金授权模式取得的版权作品的运行模式,则会造成数字图书馆给予版权人双倍费用的局面。因此,在对各种授权模式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应遵循系统协调的原则。

综上所述,私权保护原则是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过程中应遵循的根本性原则,是解决版权授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利益平衡原则是用来调和版权人、出版者、数字图书馆和公众各主体间利益矛盾的指导性原则,是解决版权授权问题的关键所在;“风险-效率”原则是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应变性原则,是提高版权授权效率的具体路径;系统协调原则是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目标性原则,是高效解决版权授权问题的努力方向。

6.3 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具体思路

6.3.1 馆藏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的版权授权模式

数字图书馆是数字化的信息资源库,在其起步阶段,对现有纸制文献进行数字化是其信息资源库的基本来源,在数字图书馆建设初期,馆藏文献的数字化处理是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首要工作。根据《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中第2条和第3条的规定,“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著作权法定实施条例》第5条第1款所指的复制行为”“利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他人作品制作数字化作品,应事先向著作权权利人直接取得授权或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间接取得授权”,

图书馆拟对馆藏版权文献进行数字化需要事先征得版权人的许可。所以，目前图书馆虽然枉有丰富的馆藏，但限于版权障碍，无法对其进行数字化。鉴于逐一取得作者授权的方式将耗费极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对馆藏资源数字化只能从法律角度另辟蹊径。

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8款规定了图书馆出于“陈列”与“保存”的需要，可以不经授权、无须付费即对传统以纸张、胶片等载体形式存在的作品进行数字化，但是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的数字化复制，其直接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发挥网络便捷性的优势，改变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为更多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而非“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所以，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不适用于数字图书馆，在版权保护力度日渐加强的今天，试图扩大合理使用范围，将其延伸至数字图书馆的数字化行为的想法行不通。而法定许可模式在馆藏文献数字化方面则有其可适用性：首先，数字图书馆对馆藏文献的数字化行为符合法定许可的立法思路，法定许可主要适用于作品发表后的扩大传播，而数字图书馆将传统版权作品复制上载行为则以数字化及网络服务形式提高了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效率；其次，数字图书馆对馆藏文献的数字化行为符合法定许可的立法目的，法定许可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公共利益，满足社会的普遍精神需求，促进全社会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而数字图书馆的数字化行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向公众提供信息资源服务。这里笔者建议修改《著作权法》，将数字图书馆的法定许可使用权扩充入法律调整范围内，针对馆藏资源数字化行为适用附带义务的法定许可模式。

所谓附带义务的法定许可模式，是指公益性图书馆可以不经版权人同意，对其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操作，但应向版权人支付一定报酬，同时，被批准

的公益性图书馆有采取技术措施防止其复制行为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义务及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交数字化作品版权信息的义务。选择该模式授权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需加以明确：一是法定许可的对象严格限定于公益性图书馆。这是出于对公益性图书馆的公益性和可靠性的考虑，法律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特定范围对作者实施复制权禁止使用权利的豁免规定。二是费用的收取和转发。公共图书馆是由国家全额资助的事业单位，其进行数字化操作的费用应由国家买单，该费用交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或中国著作权报酬收转中心一次性收取并代为转付作者。三是附带义务。复制权作为著作权的一项基本权利，进行数字化操作的机构必须通过技术措施控制其复制件的数量以及可并发数，不能因复制行为对作者的利益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否则也要承担一定的侵权赔偿责任。四是作者就费用问题获得救济的权利和机制。当版权作品被图书馆未经授权获得便利使用后，作者未能获得相应的费用时，应有相应的救助机制，避免使法定许可的报酬请求权化为一纸空文。

6.3.2 作品传播过程中的版权授权模式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但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性，该环节也成为最容易遭遇版权纠纷的环节，所以图书馆应选择不同的授权模式和不同的使用方式传播作品。

1. 对于过版权保护期的馆藏作品——合理使用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第7条的规定，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的服务内容仅限于向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

制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图书馆藏的数字化利用有所保留,不仅对数字化的作品种类进行严格的限制,而且服务范围也限于馆舍内对象,而对提供的图书是否受到版权保护却未进行区分。那就意味着,即便公众想借阅已进入公有领域的非版权图书也需要到图书馆亲自办理借阅。事实上,过了版权保护期的馆藏作品其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已不受《版权法》保护,为了提高信息利用的效率和价值,完全可以允许图书馆对此类图书不仅可以进行数字化操作,还可以对数字化作品通过信息网络向所有社会公众提供全文检索、全文浏览服务,支持用户下载、复制、粘贴等操作,并且不需要经版权人同意,也不需要支付作者报酬。亦即,授权图书馆对非版权馆藏作品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方面的合理使用,需要保障版权人的精神权利,即保障作者署名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性等权利的实现。

2. 对于馆藏版权作品——以著作权集体管理为中心,推行版权补偿金制度

馆藏版权作品数字化后必然要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才能发挥数字图书馆进行数字化操作的作品价值,但网络的无界性和低成本复制性同时会威胁版权人和出版商的现有利益。数字图书馆作为联系权利人、出版商和公众间的纽带,如何通过授权模式的设计和选择来平衡三者间的利益呢?笔者认为,版权补偿金制度是解决馆藏数字化版权作品(也叫存量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问题的现实选择。

产生于印刷时代的版权补偿金制度,其核心思想是针对大量复制给版权人造成的损失,采取的不是限制复制而是使权利人获得一定补偿的方式解决。时下网络传播产生复制品的形式虽然不同于印刷时代(网络时代的复制件是数字的、虚拟的,成本较低;而印刷时代的复制件是纸质或其他介质的,现

实的,成本较高),但相同的是,复制件的数量可计量。版权补偿金制度以版税的形式将支付给权利人的补偿金涵盖于复制品价格之中,复制品的使用者亦即用户对复制件的价格买单,在这一交易过程中,资源得以传播,用户得以使用资源,而作者也获得了一定的版权收益,可以说是一个共赢的结果。鉴于目前网络时代的复制件数量也可以通过 DRM 权限管理等技术实现可控和可计量,数字图书馆完全可以通过版权补偿金模式传播使用数字化的馆藏版权作品。通过版权补偿金制度,将数字化的馆藏版权作品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禁止使用权化为报酬请求权,对于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允许其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数字化的馆藏版权作品,但需要通过 DRM 权限管理控制其可以在馆舍范围内浏览和下载,或用于馆际互借中的文献传递,但应保证数字化文献采用了不可更改的特定格式,以保持作品的完整性,同时,利用数字水印技术防止被再翻印,通过硬盘绑定技术,使读者最多只能将电子图书“借阅”(下载)到本地硬盘离线阅读,而无法从本地硬盘再下载或复制,从而将由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的传播服务限制在“暂时复制”范围内。^①通过对作品浏览、下载和传递作品数量的统计,制定合理的对版权人补偿的标准,并定期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将该费用转交版权人。

3. 对于尚未出版的待版作品——以出版商代理授权为主,授权要约和创作共用为辅

出版商在出版作品的过程中,以图书出版合同为纽带与版权人有着直接的联系,鉴于此,对于尚未出版的作品(也叫增量作品),笔者认为数字图书馆应首选出版商代理授权模式取得作者和出版商的双重授权。具体而言,对

^① 张力. 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抑或其他——论数字图书馆使用作品的行为模式选择[J]. 图书情报知识, 2004 (4): 15-19.

于尚未出版的待版作品，数字图书馆可以委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或中国版权代理中心与各出版社签订协议，各出版社在出版合同中代数字图书馆谋求作者的一揽子授权。

此外，对于尚未出版的作品，如果权利人采取了授权要约和创作共用等方式发表作品，那么数字图书馆不需要经作者同意就可以以作者约定的方式使用作品。但由于授权要约和创作共用都强调作者的主动参与性，因此，在这两种模式尚未取得作者普遍认同的阶段，只能作为数字图书馆取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辅助授权模式。

4. 对于网络资源——默示许可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库的另一重要信息来源是对广泛分布于网络上的各类资源的重新组织。在互联网环境下，若对所有信息都遵循“授权—使用”的程序，将极其有碍网络传播便捷性和快速性的发挥。作者将自己的作品上载、传输到公共平台，应当认为其对网络的充分开放性、广泛传播性等特性，以及网络中的某些使用行为是明知的或者推定是明知的，^①应推定其对网络中的某些使用行为是默示同意的。例如，在博客或者论坛上发表文章或评论，可以推定作者是愿意通过互联网发布和传播该作品的。考虑到数字信息传播的特点，网络中“先斩后奏”使用作品的现象司空见惯，对于善意的传播者，作者也并不都采取侵权主张，只要其期待的权益得到保障，即使发生了侵权纠纷，鉴于传播者的友好态度和正当使用方式，法院在判决赔偿时依据“填平原则”，传播者和使用者也仅支付合理的使用费。^②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公益性数字图

① 赵莉. 网络环境下默示许可与版权之权利限制分析[J]. 信息网络安全, 2009 (2): 44-46.

② 张平. 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及授权模式探讨[J]. 法律适用, 2010 (1): 40-42.

书馆应适用默示许可,允许其对网络上的信息资源进行重组开发和利用,可以通过声明、告示等格式合同形式对张贴在其服务器上的作品适用默示许可。

6.3.3 数据库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版权授权模式

1. 数据库开发过程

在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全文数据库的建设是其信息资源库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图书全文数据库和期刊全文数据库则是全文数据库中两个最主要的类型。研究全文数据库的版权授权的取得,应首先分析图书和期刊的版权归属问题。图书全文数据库和期刊全文数据库,都涉及作者、出版社(期刊社)和数据库制作者三大利益主体。如果作者和出版社(期刊社)之间签订了转让合同或者出版者(期刊社)通过与作者签约、公告明示等方式取得了作品独家代理权,那么数字图书馆只需要取得出版商的授权即可,亦即出版商代理授权;如果作者和出版单位没有针对复制权、信息网络出版权达成相应协议,而只是授权其出版,那么就需要看作者是否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如果已经授权,那么可以通过集体授权模式取得授权,否则只能选择单独授权模式。

对于风险性大,附加值高的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适宜选用共同体授权模式。特色图书馆建设是现代图书馆的一个发展趋势,因此有利于自己特色发展的信息、作品,在不能通过共同体联盟取得授权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取得授权,或单独授权,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向权利人支付报酬。^①

① 王杰. 著作权集体管理授权模式与其他授权模式的整合[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4): 160-162.

2. 数据库利用过程——推行创作共用

特色数据库建设是现代图书馆的一个发展趋势,数字图书馆通过对信息、作品的重新组织和编排,建设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那么相应地对此类数据库就享有了汇编权。在数据库建成后的后期利用过程中,作为版权人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应以最大程度上的资源共享为目标,采用合适的授权方式来扩大作品传播范围。时下较流行的 OA 模式下的创作共用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数字图书馆可以结合自身情况,通过对创作共用协议提供的几种授权模式的选择,确定其版权授权策略。在适用创作共用模式进行授权时,笔者认为“署名—非商业性使用—保持一致”的授权模式是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的合理选择:一方面,该模式通过对署名权的保留体现了对精神权利的保护,使得数字图书馆在投入一定时间和精力建设数据库之后通过数据库的广泛使用获得社会认同度,扩大自身影响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公益职能;另一方面,“非商业性使用”和“保持一致”的条款使得使用者以极其便利的方式取得了数据库作品的汇编权和演绎权,从而进行汇编、演绎操作,衍生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免费为公众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成果。

6.4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模型的构建

6.4.1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模型的构建过程

版权问题贯穿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整个过程,由于不同的环节涉及权利类型有所不同,而针对不同的权利类型又适用不同的授权方

式，因此，数字图书馆需要对各种授权模式综合运用，共同解决版权问题。

数字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涉及的授权问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前期涉及如何取得权利人授权的问题；而在后期，数字图书馆作为特色数据库的版权人，则涉及如何对其他使用者授权的问题。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的首要环节是对馆藏纸质文献的数字化过程，数字化过程涉及版权作品的复制权问题，针对复制权，公益性数字图书馆适用附带义务的法定许可形式取得授权，在数字资源传播环节上，应结合不同的权利与资源类型适用不同的授权模式。数字资源主要包括数字化的馆藏资源、尚未出版的待版作品和网络资源三类。对于数字化馆藏资源中已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应寻求法律上合理使用的豁免权，但需要同时采用技术措施以保障版权人精神权利的实现。对于尚处于版权保护期内的馆藏版权文献，适用版权补偿金模式，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相互配合使用。通过版权补偿金模式，将权利人的禁止权降低为报酬请求权，在技术上利用控制作品的传播范围和使用方式，并通过阅读和下载量的监控确定补偿金的费用，进而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交付权利人。公众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作品，而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也获得了保障。如此，实现了版权人和公众间的利益平衡。对于尚未出版的待版作品，则应采用以出版商代理授权为主，授权要约和创作共用为辅的综合授权模式。对于网络资源，适用默示许可模式取得授权。鉴于数字图书馆的公益属性，对于自身享有汇编权的特色数据库，应采用创作共用的方式对外授权，以扩大作品使用范围。

综上所述，在数字图书馆这个统一平台上，以资源和权利类型为特征，构建决策树模型，对数字图书馆的各种授权模式进行整合，其模型如图 6-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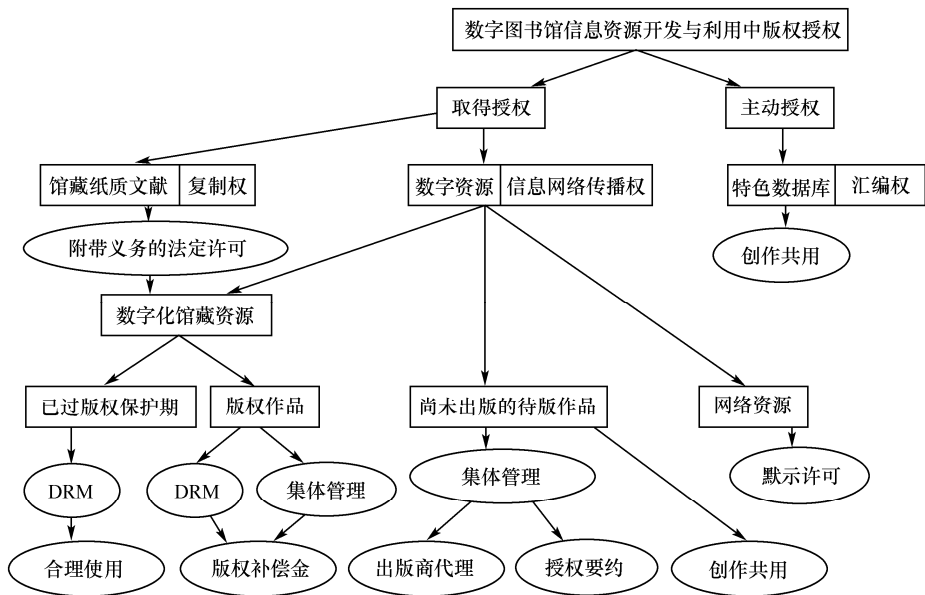


图 6-1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模型

6.4.2 模型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述模型中提到的授权模式中，既有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实践中正在使用的模式，同时也涵盖了正处于探索中的授权模式。各模式自身发展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模型实施的效果。具体而言，模型效果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法律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

1. 法律因素

模型中涉及的对于馆藏纸质文献适用的附带义务的法定许可模式、对馆藏数字化资源适用的版权补偿金模式、对于网络资源适用的默示许可模式等诸多授权模式都是笔者结合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实践，针对各环节涉及的版权类型所适用授权模式提出的一种设想，因此，目前尚无法律上

的明确依据。所以，上述模型实现的关键在于公益性数字图书馆能否在法律上获得相应的权利豁免，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认可数字图书馆所使用的版权授权模式具有法律效力。

2. 技术因素

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在处理数字化的馆藏资源传播过程中，对于非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以及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均需要采取相应的保障技术，从而规范馆藏的数字化资源的使用。目前数字图书馆在使用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技术为数字权限管理技术，该技术主要在两个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对于已过保护期的作品，技术能够保障作者的署名权等精神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对于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技术能够控制作品的非法复制，对阅读和下载数量进行监控，并以此作为版权补偿金费用支付的依据，对作者进行经济补偿。因此，技术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着作品的使用方式对原作品潜在市场和价值的影响程度。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对作品利用的方式只有在不威胁权利人的现实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法律上获得一定的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的豁免权，从而方便地取得权利人的授权。

3. 制度因素

数字图书馆海量使用作品的特点，使其面临着海量授权的难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完善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建立。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数字图书馆可以直接获得大量版权人的授权。在模型中提到的版权作品传播过程中适用的版权补偿金模式，对于补偿金的收取和发放环节也离不开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参与。针对待出版作品适用的出版商代理模式和授权要约模式也需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配合。但目前，我国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还不健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会员数量不足、收取费用分配不合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数量少、滥用垄断地位、不积极维权等问题，这都会影响著作权人采用该模式进行授权的积极性。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影响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模型实施效果中关键的制度因素。

6.5 本章小结

面向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对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进行整合一章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在这一章，首先分析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指出了授权模式进行整合需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即私权保护原则、利益平衡原则、风险-效率原则和系统协调原则；最后，以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整合依据，以四个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结合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各个环节对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进行整合模式的具体构造。

第 7 章

版权实践

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其馆藏丰富，全面入藏中文图书，截至 2007 年年底，馆藏文献已达 2 631 万册（件），115 种文字的外国文献资料占馆藏的 50%，是国内外国文献的最大藏家。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是由国家图书馆承担的国家“十五”重点文化工程，2004 年 12 月 28 日，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奠基，2008 年 9 月 9 日接待读者。国家图书馆凭借丰富的馆藏资源与互联网上的虚拟数字资源，利用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履行各种服务职能，如提供网上咨询、在线阅读、在线阅览、馆际互借、科技查新、信息推送等。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重点，该工程一直在“边建设，边服务”中积极推进。其中，解决数字资源的版权使用权问题自工程之初就一直“多条腿走路”，努力探索各种解决方案，采用多种授权模式并举的方式避免版权纠纷。

（1）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首页页面底部设有专门的“版权声明”。该声明大体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对使用者使用方式的约束，对本网站内容引用需要注明出处，对用于商业用途或非法目的以致影响国家图书馆声誉的，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二是自身免责声明，采取“通知-弥补”的策略，以公益性为支撑理由取得作者的和出版者的支持和谅解；三是对于该条款的弹性规定，国家图书馆享有声明以及其修改权、更新权及最终解释权。

(2) 出版物缴送版权声明。国家图书馆保护缴送作品的版权。对于缴送的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馆藏文献仅限于馆内读者以个人学术研究等为目的在合理使用范围内使用。同时,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防止非法下载等不当利用行为。另外,国家图书馆承担着国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责任和义务,在对网络信息及数字资源开展保存工作的过程中,以刊载“搜集方式的免责”和“搜集内容的免责”声明形式来处理网络信息资源版权问题。搜集方式的免责中对以“自动抓取”方式获得的 website 或者 webpage 如要进行数字保存,会在栏目中进行公告,公示期为 90 天(法定节假日除外),公告期届满后,对未收到拒绝申请的保存对象即可开展采集工作,并且保证采集数据不会被用于商业目的。有专门的注释,说明“拒绝表示仅限于明示方式。任何默示表示均将被理解为认可”。这实质上是在适用默示许可模式来取得作者授权,在目前法律框架下还是存在一定法律风险的。对于“搜集内容的免责”是指国家图书馆对采集到的内容不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信息内容的制作单位或个人应当对所发布的内容负完全责任。

(3) 与出版商谋求合作。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版权管理组与数字资源采集组人员积极赴各出版社调研并开展业务交流,探讨国家图书馆向出版社一揽子征集版权授权的可行性与具体操作方案。部分出版社表示,在一些断版脱销的旧书以及部分学术论文集等方面,可以考虑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并将大力配合国家图书馆出于保存目的对图书的电子版本进行征集;而对于一次性付费就可以让读者在互联网上无限制利用的方式则表示了担心。通过与出版社的直接联系,双方还可以对付费模式、并发用户等问题进行探讨。

(4) 积极探索和实践 CC 模式。随着 OA 运动的开展,CC 方式逐渐浮出水面,该方式以权利人让渡部分版权权利为主要特征,并提供若干权利组合

供使用人选择后按照该方式免费使用,CC 日渐成为全球范围相关各方探讨和实践的热点之一。2009 年 9 月,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版权管理组通过与 CC 中国大陆项目负责团队进行业务交流,双方就今后的合作达成了一些初步意向,如合作开发或完善 CC 作品元数据登记系统;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国家图书馆可作为 CC 作品整合服务提供者或内容平台提供者;共同寻求与高等院校等学位授予机构合作,将其学位论文的保存与利用纳入 CC 协议模式;双方联合策划、开展以 CC 为主题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等。双方在如何以 CC 方式促进精品文化资源传播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建设性的探讨。

(5) 版权征集。国家图书馆网站载有《版权征集启事》,全年面向全社会征集数字版权(主要指作品数字化形式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权利人捐赠数字版权,作品权利人既可选择授权国家图书馆专有使用或非专有使用,也可以选择将数字版权全部或部分转让国家图书馆。获赠数字版权后,国家图书馆即向捐赠人颁发荣誉证书,以资纪念。对于欲有偿授权或转让的版权人,国家图书馆有专人接洽谈判与签约、付酬事宜,即采用单独授权模式取得授权。

(6) 版权作品的使用方式。国家图书馆不同的资源系统对读者的访问权进行了控制,馆藏中文图书、博士论文、音频、视频等国家图书馆自建资源库,在网上展示性地向读者提供服务,读者只能阅读或欣赏作品的部分内容;对于不受版权限制的资源,如民国文献、数字方志、甲骨文献等资源库,无论注册用户还是匿名用户,使用都不受限;对于通过网络采集和报社缴送方式收集的今年来出版的数字报纸,提供浏览和检索服务。

从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对于版权授权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看出,版

权授权模式的综合性应用是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的必然选择，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在其版权实践中也是在摸索中前进。默示许可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网络资源的版权授权，在现行法律制度下，该模式是存在法律风险的。在促进文献信息资源传播方面，CC 模式可以更好地平衡版权人、数字图书馆和公众间的利益。而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对于其以公益性为名免费获得或付较低报酬获得的版权作品必须通过 DRM 控制作品的使用数量，来最大限度地控制作品传播范围，消除或降低对作品潜在市场价值的影响。

结 语

一、本研究的主要工作

本研究是笔者在系统调研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本人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毕业论文、承担与参加的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利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撰写而成的。本研究以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各个环节涉及不同的版权利用形式为切入点,分析不同类型版权所适用的授权方式,创新性地从权利分解角度将各种版权授权模式整合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各具体环节之中。

二、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

(1)挖掘数字图书馆所具有的特殊社会价值。与一般的网络运营商相比,数字图书馆在信息网络传播方面,具有资源更丰富、运营更持久、更能凸显公平正义等优势。

(2) 对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行了明确定位。数字图书馆的法律性质属公益性质,法律地位是集版权人、版权作品传播者和版权使用者三重角色于一身。

(3) 对数字图书馆所适用的各种版权授权模式进行了整合。从权利分解角度探讨了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各环节涉及的版权类型所适用的授权模式,并将各模式整合于数字图书馆这个统一平台上。

三、本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取得版权人的授权,是数字图书馆解决版权问题最稳妥的方式。面对数字环境下海量授权的难题,高效授权模式的构建对于扫清数字图书馆的版权障碍,推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虽然在论文准备和撰写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限于本人水平,目前的研究成果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本研究在对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只是提出了一种模式整合的思路,而未利用相关的评价标准对该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2) 本研究未构造出数字图书馆进行版权授权实际操作模型,只是侧重于从法律角度寻求授权上的豁免,而对于授权过程中涉及的管理机制、协调机制等问题均未论及。

四、对本研究的后续展望

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网络技术的特点使得《版权法》未赋予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等同的权利例外，但技术的进步也为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方便取得版权人授权进而使用作品的可能性。笔者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够设计出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版权授权模式及其评价体系，并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参 考 文 献

- [1] Eschenfelder. K. R. Every Library's Nightmare?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and Licensed Scholarly Digital Resources[R/OL]. [2008-08-15]. http://dlist.sir.arizona.edu/1803/01/everylibrarynightmare_tpml.pdf.
- [2] Fran oise Vandooren,Cécile. Giving New Life to Out-Of-Print Books: When Publishers' and Libraries' Interests Meet[J]. Learned Publishing,2008(3): 1-5.
- [3] 杨蓉. 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授权方式研究[D].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08.
- [4] 陈秀钦, 傅文奇. 论图书全文数据库版权授权的获得[J]. 图书馆学研究, 2007 (6): 90-91, 95.
- [5] 周淑云. 从法学家与数字图书馆版权之诉看我国数字图书产业的版权授权[J]. 情报资料工作, 2006 (2).
- [6] 刘志刚. 数字时代版权授权方式比较研究与图书馆适用[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 (8): 91-95, 116.
- [7] 高琳.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问题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05.
- [8] 刘晓婷. 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研究[D].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2007.
- [9] 孙明.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使用制度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7.
- [10] 许波. 基于适度保护原则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对策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07.
- [11] 刘燕. Google Library 版权政策的思考[J]. 情报科学, 2009 (1): 57-59.
- [12] 马海群, 严雯.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价值与制约因素分析[J]. 图书与情报, 2009 (1): 51-54.
- [13] 吴志荣. 数字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实[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14] 高继明, 唐天旭. 论数字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及其体现方式[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 (32): 39-40.
- [15] 夏立新等. 数字图书馆导论[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 [16] 陈传夫, 冉从敬. 数字图书馆法律属性初探[J]. 图书馆论坛, 2003 (6): 217-219.
-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 [18] 陶锡良. 数字图书馆职能及相关法律问题初探[J]. 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 (4).
- [19] 闫冬. 浅析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属性[J]. 法制与社会, 2008 (35): 340.
- [20] 周恬. 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侵权问题[D].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2009.
- [21] 李明仪.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J]. 黄山: 黄山学院学报, 2009 (4): 130-132.
- [22] 肖燕.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与数字图书馆[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 [23] 陈若兵.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版权问题研究[J]. 东莞: 东莞理工大学学报, 2008 (4): 99-102.
- [24] 殷凌云, 郝曦. 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问题探讨——以多起典型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为例[J]. 电子知识产权, 2007 (5): 49-51.
- [25] 江向东. 版权制度下的数字信息公共传播[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 [26] 黄纪阳.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著作权问题及保护制度研究[J]. 江西图书馆学刊, 2009 (2).
- [27] 王静君.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著作权问题探析[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08 (7): 48-51.
- [28] 周洁凤. 数字图书馆与数据库的知识产权保护[J]. 图书馆, 2006 (4): 60-62.
- [29] 李勇宁. 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问题[J]. 科技信息, 2008 (26): 10-11.
- [30] 王斌.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 [31] 陈秀钦, 傅文奇. 论期刊全文数据库版权授权的获得[J]. 情报探索, 2007 (9): 65-67.
- [32] 张平. 现行法律框架下数字版权问题如何解决——以数字图书馆为视角. <http://www.jsbq.org/dynamicinfo.aspx?id=821>, 2009-4-3.
- [33] 刘春田. 知识产权法 (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34] 骆电, 胡梦云. 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合法性与合理性判析——由谷歌数字图书馆引发的思考[N]. 人民法院报, 2009-12-17.

- [35] 张怀涛. 集体授权机制和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J]. 图书与情报, 2002 (3): 5-8.
- [36] 胡卫丽. 数字环境下著作权许可模式研究[D].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2006.
- [37] WIPO,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Study on, and advi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rganizations, WIPO Publication No. 688(E), 1999.
- [38] Jay. M. Fujitani, "Controlling the Market Power of Performing Rights Societies: an Administrative Substitute for Antitrust Regulation", 72 Calif. L. Rev. 103, (January, 1984).
- [39] 赵宾. 个人授权模式的兴起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变革[J]. 河南社会科学, 2009 (3): 80-82.
- [40] 王杰. 著作权集体管理授权模式与其他授权模式的整合[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 (4): 160-162.
- [41] 周月. 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授权模式完善的途径[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9 (4): 58-60.
- [42] 刘志刚. 博客作品适用版权授权方式的可行性分析[J]. 知识产权, 2006 (4): 42-46.
- [43] 刘晶. 对数字图书馆取得著作权人授权途径的分析探讨[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8 (9): 156.
- [44] 王秀丽, 于秀丽. 授权要约: 数字版权贸易的新模式[J]. 出版发行研究, 2008 (9): 21-24.
- [45] Robert J. Morril. Contract Formation and the Shrink Wrap License, 32 New Eng. L. Rev. 515-516 (1998).
- [46] 熊琦. 网络著作权授权使用之合理性初探[J]. 电子知识产权, 2006 (12): 12-15.
- [47] 齐蕾. 公共文化机构使用数字信息的若干授权模式分析[J]. 档案, 2008 (4): 15-17.
- [48] 秦珂. 网络环境中影响馆藏绩效的授权模式评介[J]. 情报资料工作, 2005 (3): 49-52.
- [49] 张平. 数字图书馆版权纠纷及授权模式探讨[J]. 法律适用, 2010 (1): 40-42.
- [50] 姚德权, 赵洁. 中国版权代理业的考量与发展[J]. 编辑之友, 2007 (6): 19-22.
- [51] 王杰. 网络版权环境下公益性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08 (2): 93-95.
- [52] 庄善杰. 基于权利弱化理论的图书馆版权利益平衡制度的实现[J]. 情报探索, 2008 (12): 86-88.

- [53] 胡科学. 浅析数字权限管理在图书馆中的应用[J]. 中国科技信息, 2009 (9) .
- [54] 郭德华. 数字图书馆实施 DRM 的对策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05 (5) .
- [55] 刘燕. Google Library 版权政策对图书馆授权模式探索与创新的启示[J]. 情报资料工作, 2008 (6): 66-68, 75.
- [56] 吕炳斌. 网络时代的版权默示许可制度——两起 Google 案的分析[J]. 电子知识产权, 2009 (7): 73-76.
- [57] Jonathan Band.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Libraries And The Google Library Project Settlement[J].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November 13, 2008.
- [58] 王斌. 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强制许可制度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08 (12) .
- [59] [美]约内森·罗森诺. 网络法: 关于因特网的法律[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 [60] 梅术文. 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不足与完善[J]. 法学, 2009 (6): 50-58.
- [61] 秦珂. 版权补偿金制度和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5 (2): 155-158.
- [62] open access, 开放获取(开放存取)定义[ES/OL][2008-08-08]. <http://www.oalib.com/html/xwdt10Ajieshao/5776.html> [2009-02-01].
- [63] Gerry McKiernan. Perspectives in electronic publishing: an open access-dynamic-virtual electronic journal[J]. Library Hi Tech News, 2001, (8): 19-27.
- [64] 李明理. 开放获取及其对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的影响[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357-359.
- [65] 刘海霞, 方平, 胡德华. 开放存取研究进展述评[J]. 图书与情报, 2006 (4): 10-16.
- [66] 宗诚, 马海群. 数字图书馆视角的开放存取机制及著作权授权制度的优化[J]. 图书情报知识, 2009 (3): 105-108.
- [67] 洪伟达, 马海群. 面向信息权利的著作权制度效率改进——以创作共用为视角[J]. 图书馆论坛, 2008 (6): 232-236, 256.
- [68] 吴晓萍, 周显志. 创作共用: 一种新的鼓励自由创作的版权许可制度[J]. 知识产权, 2006 (3): 69-72.
- [69] 杨雁. 版权问题新思路: 知识共享协议[J]. 新世纪图书馆, 2008 (6): 44-46, 12.
- [70] 马海群, 周丽霞. 数字图书馆视角的著作权授权模式整合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09 (21): 29-32.

- [71] 张力. 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抑或其他——论数字图书馆使用作品的行为模式选择[J]. 图书情报知识, 2004 (4): 15-19.
- [72] 赵莉. 网络环境下默示许可与版权之权利限制分析[J]. 信息网络安全, 2009 (2): 44-46.
- [73] 吕炳斌. 数字时代版权保护理念的重构——从复制权中心到传播权中心[J]. 北方法学, 2007 (6): 127-131.
- [74] 郑国辉. 数字图书馆中著作权“有限制”默示许可使用制度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08 (6): 40-43.
- [75] 郑传清. 构建数字图书馆版权许可领域的“三赢”模式[J]. 商场现代化, 2007 (6): 98-99.
- [76] 董彪, 冯哲. 浅谈版权声明之若干版权问题[J]. 出版发行研究, 2009 (5): 61-64.

附录 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相关案件

案例一：陈兴良诉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侵权纠纷

2002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起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向数字图书馆发出了维权行动。

中国数字图书馆网站通过会员付费方式提供图书下载服务，网站未经陈兴良允许使用了其三部著作《当代中国刑法新视界》《刑法适用总论》《正当防卫论》。陈兴良教授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提出 40 万元的赔偿金额。面对诉讼，被告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以数字图书馆的公益性来做抗辩，这也引起了不少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同情。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侵犯了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赔偿被告经济损失 8 万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4 800 元。

案例二：知识产权专家诉“书生”侵权案

2004 年年初，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教授发现，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未经授权将其多部作品上载于“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供会员阅读。2004 年 10 月，郑成思等 7 名知识产权专家起诉书生公司，指控书生公司违

反了《著作权法》，未经其授权就在“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中擅自使用他们的作品。

法院认为，书生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也并非公益性图书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对作品所进行的 3 人以上不能同时在线阅读及只能拷屏下载的限制，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书生公司侵犯了郑成思对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停止侵权，公开向作者道歉，判决书书生公司赔偿郑成思 5.6 万余元。

案例三：方正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案

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在其 Apabi 数字图书馆资源平台中收录了 2000 年出版的《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一书，而该书的著作权人黄延复从未与方正电子就此作品的使用签署过任何协议，方正电子也未取得他的许可。2006 年年初，清华大学教授黄延复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起诉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未经自己允许，将自己所著的《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一书在“方正”公司开设的数字图书馆中使用，这种行为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

2006 年 3 月，另一知名作者杜昌维在网上发现，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涉嫌在没有与著作权人签署任何使用协议的情况下，就在该公司所经营的 Apabi 数字图书馆资源平台中收录了其作品《医院法律管理及权益维护》一书。为此，杜昌维将方正电子告上法庭，要求方正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其损失，涉案赔偿金额上万元。

案例四：中国知网侵犯著作权案

2005 年 10 月，戏剧理论家蒋星煜登录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在作者检索项中输入自己的名字，检索结果显示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共收录自己百余篇文章，出版单位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网站的相关技术由清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蒋星煜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将上述两方及光盘制作单位清华同方光盘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索赔人民币 12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享有上述作品的著作权，但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这些文章在相关报刊发表时有不得转载、摘编的特别声明，因此光盘期刊社将原告上述文章收入其电子期刊数据库编辑出版、由清华同方光盘公司制作成光盘并由清华同方知网公司发行的行为，以及在其共同主办的中国知网网站上转载原告上述文章的行为，均属于对原告作品的依法转载行为，并未侵犯原告享有的作品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上述被告转载原告的作品虽未侵犯原告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应当按照规定向原告支付报酬。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被告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3.8 万元。

案例五：法国出版集团起诉 Google 图书馆

根据“Google 图书馆”计划，Google 将把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及几所

世界顶级大学的图书馆藏书全部扫描上网，供网民在线搜索浏览。自 2004 年年底宣布这项计划以来，Google 图书馆便受到多方争议。众多出版机构对其进行反复抨击。

2006 年 6 月，法国出版集团马帝尼耶起诉 Google，称 Google 未经授权就将书籍内容扫描并放到互联网上，这种盗版行为严重侵犯了原作的知识产权。马帝尼耶集团指责 Google “盗用并侵犯了知识产权”，将其大约 100 本书扫描并上网。这些书的版权属于出版它们的出版商，而 Google 的这种做法将影响出版商的利益。

马帝尼耶的律师表示：“为了让诉讼有效，我们决定，每发现一本书被侵权，就向 Google 索赔 10 万欧元；同时，Google 每拖延一天赔偿，我们就要求增加 10 万欧元的赔偿。”

（上述案例来源：中国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sipo.gov.cn/albd/2006/200804/>

t20080402_366814.html）

